

# 步入界外： 嘉慶朝蛤仔難地圖繪製及其知識傳承\*

盧正恆\*\*

## 摘要

嘉慶十七年(1812)清帝國於蛤仔難設噶瑪蘭廳，象徵著國家勢力深入、重新定義疆界。本文以幾幅蛤仔難地圖為基礎，探討界外人士如何將民間知識製成地圖，再逐步轉化成官方可理解、利用的輿圖；此知識傳遞變遷之過程與隨後設廳似可和「乾嘉變革」中地方轉向相呼應。嘉慶三年(1798)，吳沙拓墾集團請蕭竹調查蛤仔難並繪製以四圍為中心的地圖，揭示從艋舺到丹裡、丹裡前往四圍的路線。此圖在臺灣廣為流傳，至少產生本文所分析的四種版本。嘉慶十二年(1807)，與朝廷中樞關係良好的楊廷理復職為臺灣知府，受派往蛤仔難處理朱瀆事件，即循該路線進入，楊離開該地時繪成〈楊太守新圖〉，呈現了其「加留餘埔」制度規劃和蛤仔難地理樣貌。嘉慶十二年，謝金鑾《蛤仔難紀略》將楊廷理之圖與重製之蕭竹圖作為附圖送往北京，成為官員理解此界外之地的知識來源之一。不久，同時具有〈楊太守新圖〉和蕭竹圖特徵、體現官方角度的〈噶瑪蘭輿圖〉，由閩浙總督汪志伊嘉慶十六年(1811)附於奏摺中上呈，成為這一段時間蛤仔難地區性輿圖繪製和知識傳遞之最後篇章。本文通過解析這段時間的相關地圖，企圖理解臺灣界外空間知識如何從地方社會逐步轉為帝國所利用。

**關鍵詞：**楊廷理、噶瑪蘭、淡蘭古道、乾嘉變革、海疆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清代旗人群體的海疆認識與帝國建構」(110-2410-H-A49-034-MY3)之一部分，曾以「步入界外：三幅嘉慶朝蛤仔難地圖的繪製、利用與知識」為題在2021年10月14日「從陸地與海洋發明帝國的歷史」系列演講中發表，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所長、呂妙芬研究員、馬騰副研究員、陳建守助研究員提問並惠賜意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蔡名哲博士後研究員提示楊廷理圖的存在，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謝仁晏先生建議至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搜找該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詹素娟研究員、宜蘭縣史館廖英杰館長、東吳大學歷史系鄭螢憶副教授也給予筆者諸多建議。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吳佩璇小姐亦與筆者多次討論、交流。另外，兩位匿名審查人與近史所編輯們提供的建議和資料，均使本文更為完善，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22年1月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9月30日。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 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有一份原藏於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的〈嘉慶年間噶瑪蘭番社分布圖〉（以下簡稱〈番社分布圖〉，參見圖 1），<sup>1</sup>詹素娟與陳南旭推測該圖或為蕭竹所繪（詳第二節）。2020 年筆者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閱覽該館典藏的〈艋舺街至濁水海道圖說〉（以下簡稱〈海道圖說〉，參見圖 2），發現該圖與〈番社分布圖〉雖然雷同，但有不少相異之處。<sup>2</sup>同年，一幅幾乎與〈海道圖說〉相同的圖繪〈臺北基隆近傍圖〉在日本拍賣網站上競售（以下簡稱〈北基近傍圖〉）。<sup>3</sup>三幅地圖輪廓雷同，後二幅地圖在文字描述上幾乎一致，〈番社分布圖〉則增添更多番社，路線上也略有不同。撇除細微差異，乍看之下，很可能誤以為這三幅圖是同一畫作。此外，另有一幅被收於《軍機錄副》的〈噶瑪蘭輿圖〉，與此三圖雖然內容有所差異，但亦有相似之處。<sup>4</sup>為何會有這三幅地圖之存在？其繪製的原因與目的為何？和〈噶瑪蘭輿圖〉的可能關係又為何？配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蛤仔難紀略》中的附圖〈蕭松友圖〉、〈楊太守新圖〉，將之一併置於清帝國兼併蛤仔難的歷史脈

<sup>1</sup> 此圖原藏於天理大學，為陳秋坤教授複印黑白影本並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嘉慶年間噶瑪蘭番社分布圖〉，檔案號 T0357M0013；感謝詹素娟研究員提示此圖之存在。天理大學圖書館原先無法尋覓該圖，後在筆者與該館館員合作下覓得該圖，題名為〈噶瑪蘭番圖〉，尺寸為長 60 公分、寬 101 公分，登錄號為 292.2-子 21。

<sup>2</sup> 此圖長 91 公分、寬 60 公分，該館認為其製作時間約在 1875 到 1911 年間；感謝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提供此圖影像。參見 [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9679430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9679430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E8%89%8B%E8%88%BA%E8%A1%97%E8%87%B3%E6%BF%81%E6%B0%B4%E6%B5%B7%E9%81%93%E5%9C%96%E8%AA%AA&offset=0)  
[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E8%89%8B%E8%88%BA%E8%A1%97%E8%87%B3%E6%BF%81%E6%B0%B4%E6%B5%B7%E9%81%93%E5%9C%96%E8%AA%AA&offset=0](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9679430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2021 年 10 月 6 日檢索）。

<sup>3</sup> 該網站為 <https://auctions.yahoo.co.jp/>，筆者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瀏覽此圖，可惜目前尚未知悉何人成功競標到該物件，因此無法提供該圖影像，下文將用文字描述此圖與〈海道圖說〉的差異。

<sup>4</sup> 不著作者，〈噶瑪蘭輿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 03-1693-034。該圖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目錄中稱〈呈噶瑪蘭輿圖〉，但該檔案封皮上寫〈噶瑪蘭輿圖〉，本文從原檔之名。

絡下，筆者認為，這三幅圖是吳沙拓墾集團所聘僱、熟悉「堪輿風水」的蕭竹於嘉慶五年（1800）所畫圖像（簡稱蕭竹圖）的相關產物，目的在說服清廷兼併蛤仔難，但並未成功。<sup>5</sup>嘉慶十二年（1807）朱潰侵擾蛤仔難，蕭竹圖為力主兼併的復任臺灣知府楊廷理所用，循圖指引進入蛤仔難；同時也成為地方官員認識蛤仔難空間的最初憑藉，更是之後官方繪製輿圖的知識來源之一，例如楊廷理繪製〈噶瑪蘭輿圖〉之基礎，進而成為嘉慶十六年（1811）閩浙總督汪志伊領銜上奏陳請設立噶瑪蘭相關章程之附件。換言之，由界外人群所製的地圖，最終成為邊疆官員利用的工具。本文將著重於地圖研究、帝國兼併蛤仔難的過程，並將這些地圖置於「乾嘉變革」（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脈絡下，做為理解一起清帝國邊疆殖民的知識建構過程的典型示例。

本文將放於地圖研究、帝國兼併蛤仔難、乾嘉變革等框架下。學界過往關於清代臺灣地圖研究可劃分為兩大面向，其一是繪圖知識傳播，其二則是聚焦於和帝國統治界內、外策略的修正。如陳宗仁對東亞地圖的分析著重於知識的傳播和建構，揭露不同人群對包括臺灣在內的繪圖體系。<sup>6</sup>此外，圍繞著〈番界圖〉，早先有施添福、杜正勝等對番界圖變動進行介紹。<sup>7</sup>其後，林玉茹、畏冬引介討論紫線圖；蘇峯楠聚焦紫線圖繪製結構和內容細節，並將圖層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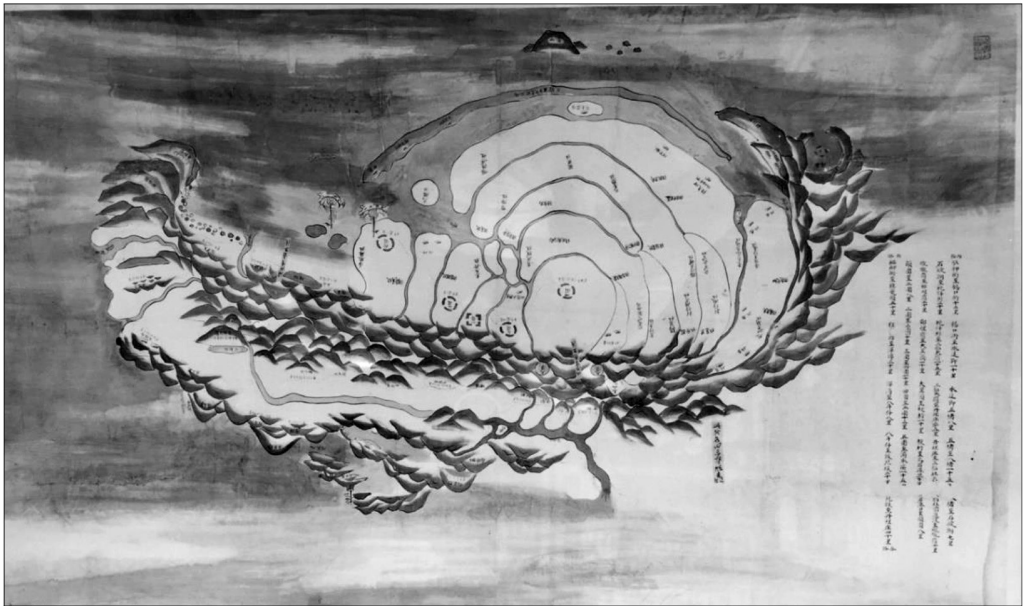
<sup>5</sup> 由於我們僅能理解這三幅圖是蕭竹繪圖的延伸產物，有共同的來源，但並無法確定孰先孰後，加上本文也將討論簡化自蕭竹原圖的〈蕭松友圖〉，因此下文若沒有特別指出哪一幅圖，將以「蕭竹圖」三字代稱蕭竹所繪製的原圖。特此說明。

<sup>6</sup> 參見以下陳宗仁相關研究成果：〈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之研究：兼論鳳山縣關隘的描繪〉，《臺灣史研究》，卷 25 期 1（2018 年 3 月），頁 1-38、〈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卷 23 期 3（2016 年 9 月），頁 1-42、〈院藏清初福建省地圖——一幅新舊知識交雜的地圖〉，《故宮文物月刊》，期 357（2012 年 12 月），頁 32-41、〈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1-46、〈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 年 6 月），頁 109-164、〈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卷 27 期 3（2020 年 9 月），頁 1-42。

<sup>7</sup> 參見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卷 39 期 2（1989 年 6 月），頁 95-98、〈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期 19（1991 年 6 月），頁 46-50；杜正勝，〈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古今論衡》，號 8（2002 年 7 月），頁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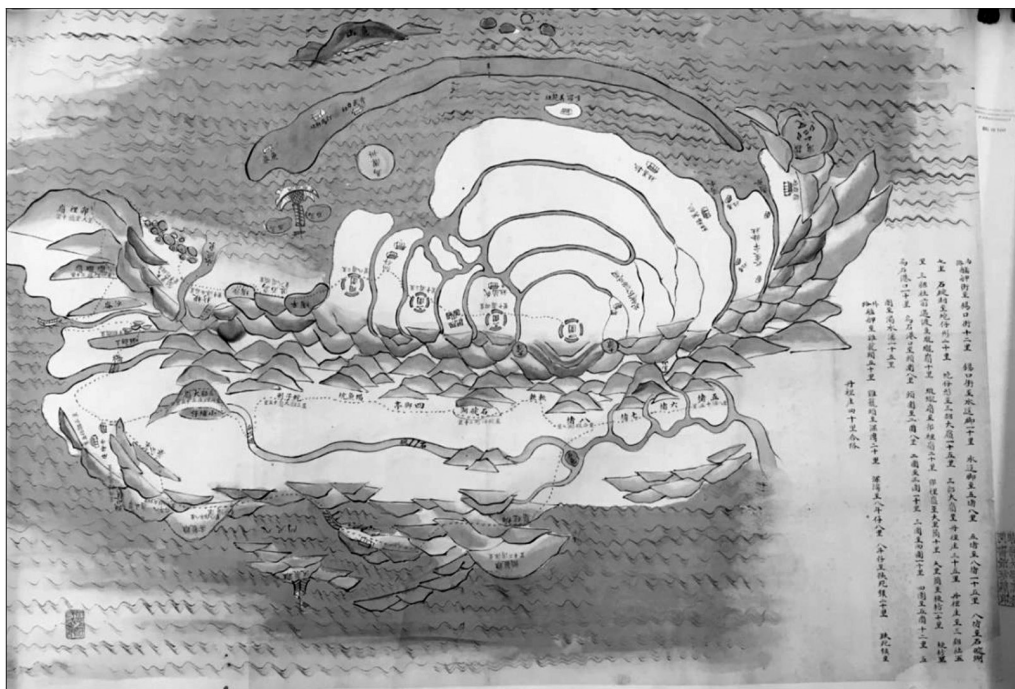
置於清代番界治理的政策下討論；陳志豪分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臺灣文武官員在〈乾隆臺灣輿圖〉基礎下完成的番界與西部臺灣空間展示；<sup>8</sup>柯志明通過紫線圖，闡釋清帝國從「二分式」轉向「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sup>9</sup>然而，過去的研究集中在西部地區，對於三貂嶺／社外、番界外的蛤仔難和後山區域關注較少。本文將在界內、外討論及知識傳承脈絡下，探討界外人士如何繪製界外地圖，帝國、界外、官員、地方群體間如何交織互動，知識又是如何被傳遞、積累。

圖 1 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噶瑪蘭番圖〉



- <sup>8</sup> 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47-94；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繪製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啓為中心〉，《臺灣史研究》，卷 22 期 3（2015 年 9 月），頁 1-50；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灣史研究》，卷 24 期 4（2017 年 12 月），頁 1-33。
- <sup>9</sup> 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卷 22 期 2（2015 年 6 月），頁 45-110。

圖 2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艋舺街至濁水海道圖說〉



雖然有關蛤仔難地圖的研究較為罕見，但此空間並未被研究者忽視。先行研究者如許倬雲，以地方志為主要材料，分析十九世紀前期噶瑪蘭人口成長率、出口導向產米農業、宗族戶籍結構，闡述在缺乏政府力量下，當地人士如何引領殖民活動；<sup>10</sup>廖風德、詹素娟以區域研究角度解析清代噶瑪蘭與族群之歷史發展；<sup>11</sup>施添福從環境、拓墾、行政等角度，建構蘭陽平原聚落分類的理

<sup>10</sup> Cho-Yun Hsu, "I-L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33 (Spring 1972), pp. 51-71.

<sup>11</sup> 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一個台灣史的區域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2）；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論框架；<sup>12</sup>李信成以楊廷理文集、奏摺等材料，對噶瑪蘭開墾、行政安排、番社處理有著詳盡討論；<sup>13</sup>陳南旭關於清帝國納入蛤仔難的系統性研究，從社會、經濟需求等層面討論推動蛤仔難納入帝國疆域的各種因素，主張地方力量和米糧價格是主導的關鍵之一。<sup>14</sup>上述研究聚焦於地方社會，史料多仰賴方志、契約等；本文則期望通過地圖以提供更清晰的視野與新的篇章。

最後，本文也置於清史論述中。1990 年代，「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非正式地」誕生。<sup>15</sup>由於「新清史」聚焦於盛清(High Qing)，對嘉慶朝的忽視同樣激起學者之興趣。2011 年羅威廉(William T. Rowe)強調嘉慶朝的重要性，強調「乾嘉變革」(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之概念，闡述嘉慶皇帝如何將帝國從極盛後的衰頹中挽救出來。<sup>16</sup>本文即通過地方與官員對地圖的利用與再製，體現嘉慶朝帝國擴張之案例與乾嘉變革的「地方轉向」(localist turn)的關係。

<sup>12</sup>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

<sup>13</sup> 李信成，〈清代邊區設治與原住民族治理——以楊廷理創始臺灣噶瑪蘭廳為例〉，收入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115-148。

<sup>14</sup> 陳南旭，〈19 世紀初年臺灣北部的拓墾集團與噶瑪蘭的移民開發〉，《臺灣文獻》，卷 67 期 2 (2016 年 6 月)，頁 133-156、〈經貿發展與臺灣邊疆的變遷：十九世紀之交的蛤仔難〉，《國史館館刊》，期 61 (2019 年 9 月)，頁 1-41。噶瑪蘭納入版圖後，相關的社會治理之研究則可參見李信成，〈清代宜蘭的官舉族長及其功能探討〉，《臺大歷史學報》，期 55 (2015 年 6 月)，頁 67-124。

<sup>15</sup> 筆者稱「新清史」乃「非正式」誕生，因為即便 1990 年代出現不少研究範式，可是多屬於被貼上標籤，罕有歐立德定義下的 New Qing History 研究。參見 Mark C. Elliott, "Book Reviews: Pei HUANG,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JESHO*, 54:4 (January 2011), pp. 584-588;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 9;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 3.

<sup>16</sup> 參見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32:2 (December 2011), pp. 74-88。米丹尼(Daniel McMahon)稱之為「革新」(restoration)，參見 Daniel McMahon,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8:2 (June 2008), pp. 231-255; Daniel McMahon,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地圖」的功能之一在於區別界內、外人群，但本文所呈現三幅與蕭竹相關的地圖卻是由界外人群反向重新定義邊界，甚至大量生產傳播。其形制、觀察角度、外觀，呈現了繪製者從東北海岸與丹裡觀察下的獨特視角，並揭示二條從「界內」通往「界外」的路線。楊廷理經由此路線，於嘉慶十二年初次赴蘭，待離開時繪製〈楊太守新圖〉，此圖側重於蛤仔難內各聚落、番社的通行路線、東西勢局勢，不過同時也標示出了異於入蘭隴嶺線的三貂嶺線；此路線隨後在他「重定」的〈噶瑪蘭輿圖〉中同樣被標示，並在嘉慶十六年由汪志伊進呈皇帝、提供建言。隨著被謝金鑾收入《蛤仔難紀略》中，蕭竹圖也通過人脈網絡被朝廷官員過目瀏覽，成為知識來源之一。簡言之，經由對帝國併蛤仔難為噶瑪蘭前，諸份地圖繪製過程和傳播脈絡的清理，可以構築出地方官員與邊疆（界外）社會、人群合作之結果，蕭竹所繪地圖最終成為噶瑪蘭地區的輿圖基礎與清廷設置、規劃署廳方位時的依據之一：或可視為嘉慶朝帝國任務下放由地方主導之地方轉向的案例。

## 二、地圖基底、比較、分析與繪者

學界雖已知〈番社分布圖〉、〈海道圖說〉，但進一步的分析有限，<sup>17</sup>遑論〈北基近傍圖〉直到 2020 年才於網路上問世、拍賣、收藏。<sup>18</sup>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蛤仔難紀略》中收有〈蕭松友圖〉一幅，似乎也未被詳實討論。因此，本節首先將比較、分析四幅圖，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各收藏有謝金鑾《蛤仔難紀略》，前者刊行時間未知，

<sup>17</sup> 該圖曾由詹素娟在一場演講中提及，陳南旭在其碩士論文與 2016 年的文章中亦均提及此圖與蕭竹圖的雷同之處，不過因陳南旭並未閱覽過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海道圖說〉，因而在碩論推測蕭竹乃〈番社分布圖〉的作者。但地圖與相關衍伸討論並非陳氏主要關注對象。參見陳南旭，〈清代臺灣噶瑪蘭廳的成立與社會變遷（1786-18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19、〈19 世紀初年臺灣北部的拓墾集團與噶瑪蘭的移民開發〉，《臺灣文獻》，卷 67 期 2，頁 139-140。

<sup>18</sup> 三幅地圖的左下角均有「北平莊氏藏記」收藏章，因此或許原先皆屬於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之收藏。莊靈，〈從歷史影像憶談北溝故宮的故事〉，《止善》，期 23（2017 年 12 月），頁 17-60。

但根據謝金鑾自序（而非〈後序〉），可知該書成於嘉慶十二年；<sup>19</sup>後者則為道光十四年（1834）重刊版。<sup>20</sup>

謝金鑾撰寫〈圖說〉的主要用意是釐清不同蛤仔難地圖所產生的疑惑。<sup>21</sup>《紀略》最重要的散播者之一鄭兼才將此書予其師、時任內閣學士的汪廷珍過目時，提到《紀略》：「內備四圍。」<sup>22</sup>《紀略》包括〈形勢〉等篇亦論及五圍甚至東勢等地，因此所謂「內備四圍」，即指該書附圖的狀況。楊廷理在〈蛤仔難紀略序〉寫下：

慮三圖之惑後觀，故作〈圖說〉。〈形勢〉、〈道里〉，以輔圖也。夫值孔亟之勢，因效順之民，審形勢，考道里，按圖以稽，迎機立斷，可矣。<sup>23</sup>

楊廷理說明《紀略》中三大部分是為了配合地圖所書寫和閱讀的產品，而鄭兼才的說法指稱著《紀略》有著一幅「四圍」的地圖，因此蕭竹之圖即隨著《紀略》被送予諸多朝中大臣瀏覽。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的《蛤仔難紀略》收有附圖四份，分別是〈諸羅志後山圖〉、〈蕭松友圖〉、〈楊太守新圖〉、〈蘇澳圖〉，與〈圖說〉中比較的《諸羅志》、徐夢麟、蕭竹、楊廷理的四幅圖有所不同，並未收錄徐夢麟之圖；本節將先簡探〈蕭松友圖〉。三種《蛤仔難紀略》版本在〈圖說〉的部分內容相同，有關蕭竹圖稱：「蕭竹甚悉於蛤仔難，乃其為圖，則專寫四圍；以其時竹為吳沙卜四圍地，特誇其妙，故為圖坐乾向巽，

<sup>19</sup> 可參見〔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謝序，頁 3，中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可查見數位檔，<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08188.0>（2023 年 6 月 30 日檢索）。按，「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為清末京師圖書館，1951 年更名「北京圖書館」，1998 年再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此版本首頁鈐有「北京圖書館」印，因此應於 1951-1998 年間收入館藏。本文以下稱此版本為「中國國圖版」。

<sup>20</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3），冊 19，頁 305。下文引用此版，簡稱「北京師範版」。「中國國圖版」、「北京師範版」二種版本與道光十七年（1837）成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刊行《噶瑪蘭志略》中所收錄的內容均有差異，多數內容涉及番社、納蛤仔難之文字，除與本文有關連處，其他將留待他文討論。此二種版本感謝集刊編輯同仁 A 之提示與資料提供。

<sup>21</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 13，頁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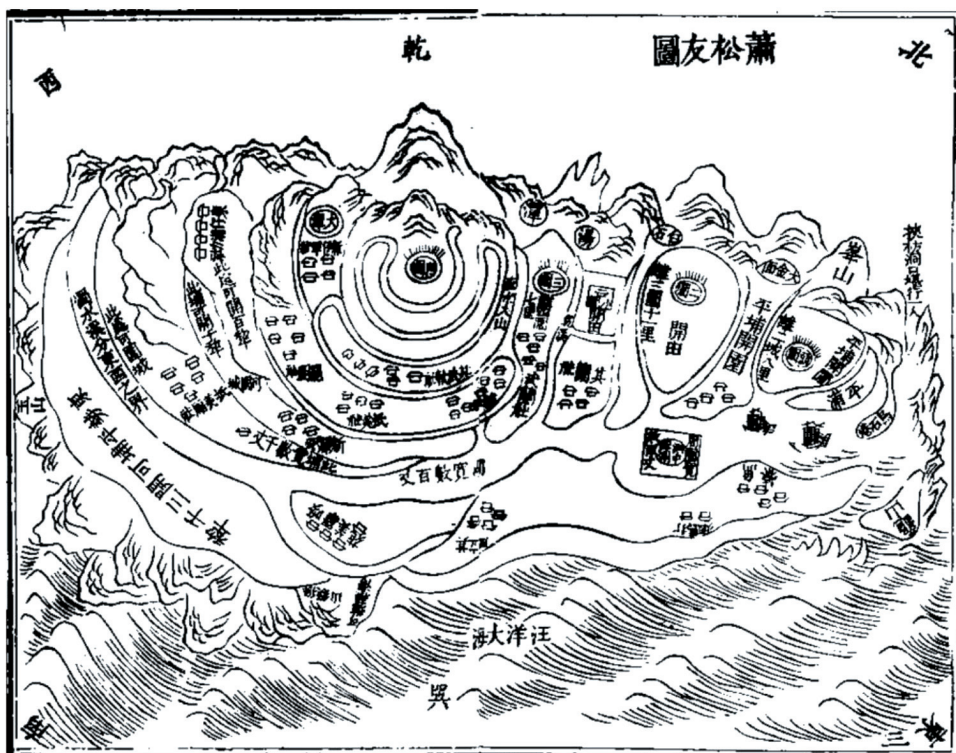
<sup>22</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卷 8，頁 378。

<sup>23</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9-180。



其言後山之豐脈，水法之迴抱，雖於山川之向背特詳，要皆為四圍言之，僅可稱四圍圖，而不可以蛤仔難名之也。」<sup>24</sup>〈蕭松友圖〉上標示二處「可圍城」，符合《志略》所載：「時未有五圍、六圍，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圖中皆遞指之，後乃遵建焉」<sup>25</sup>有附圖的中國國圖版則載：「時未有五圍、六圍，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圖中皆遞指之，後悉如其言。」<sup>26</sup>仔細瀏覽此圖，反而更像是土地、聚落的標示圖，對於地景地貌的描寫不多。在地點的標示上，與下文所述三圖相當類似，諸如沙洲上讀「魚寮」等處都類似，卻又增加了些許蕭竹畫圖時不該出現的資訊，例如東勢「東勢平埔可開三千犁」等（參見圖 3）。

圖 3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蛤仔難紀略》之〈蕭松友圖〉



<sup>24</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8。

<sup>25</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1。

<sup>26</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中國國圖版），頁 3。

蕭竹繪圖時更重視西勢，並出現不少開墾建議標示的痕跡。例如〈蕭松友圖〉在如「二圍」、「小圍」等旁寫下的「開田」，另外在東仔滿力社旁有「此處可開百犁」、「此埔可開千犁」，另外尚有許多土地大小的紀錄，例如湖寬數百丈等紀錄，標示建議開墾的位置、範圍。再者，若觀察此圖「抵美社」的位置，與〈海道圖說〉不同，更接近後文所分析的〈番社分布圖〉，與擺厘社在同一環內；而下文將論述〈番社分布圖〉的繪製時間或晚於〈海道圖說〉等圖。因此，此圖是否是《蛤仔難紀略》出版時依照謝金鑾瀏覽的蕭竹地圖所重製的作品呢？

繼續觀察〈蕭松友圖〉，可發現此圖右側、烏石港旁（同時也是頁面邊框處）標示「挾枋洞口勘行一人」，這一段話在〈甲子蘭記〉中亦有類似的描寫：「道途危險，洞口祇行一人。」「挾枋」該是「梗枋」之誤寫。<sup>27</sup>不過，〈蕭松友圖〉還出現了幾處與不符合蕭竹繪圖時該出現的路徑中繼站，例如大金面、白石等均為之後出版的《蛤仔難紀略》配合在蛤仔難內部移動才提到的地名。<sup>28</sup>根據這些差異，考量到《紀略》書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服國家納入蛤仔難，因此所收〈蕭松友圖〉很可能是為了收入《紀略》中，基於原圖而重新繪製的簡圖，往往是為了印製而將原始地圖簡化收入印刷品頗為常見的過程。那原始的圖像為何呢？

謝金鑾記蕭竹抵蛤仔難後：「悉為賦詩，或論述其山水，遂為圖以出，其圖於山水脈絡甚詳。」<sup>29</sup>筆者認為〈蕭松友圖〉和本文前述的三幅圖間有明顯的傳承關係，不僅方位相同，水道環繞、以四圍為中心、烏石港旁的船隻等，以及結構畫法上類似，因此雖然我們無從得知蕭竹原始所畫之圖為何，最大差

<sup>27</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頁 18。中國國圖版《蛤仔難紀略》於此，「陸路由三貂入，徑險，僅容一人行」，而非《噶瑪蘭志略》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版所寫的「陸路由三貂入，初徑險，僅容一人行」。由此可知，中國國圖版描寫狀況較早，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初」和非初的差異；參見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北京師範版），〈原由〉，頁 2；[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中國國圖書版），〈原由〉，頁 2。

<sup>28</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6。

<sup>29</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中國國圖版），〈原由〉，頁 2。

異在於本文所論三圖包含了從艋舺通往蛤仔難的路線。因此以下將論證三幅圖與吳沙拓墾集團關係甚深，或為〈蕭松友圖〉之原始版本。

三幅圖與〈蕭松友圖〉最大的差異，在於並非僅畫蛤仔難，而是描繪五堵到蘇澳間的區域。從五堵往北到雞籠沿海，轉往東北海岸，中間橫亘山脈，將蘭陽平原包覆，與雞籠、東北海岸區隔。雞籠、東北海岸有一條源自三貂大嶺向八堵流去之河，在八堵一分為二，一向獅迷嶺而去，另一途經七堵、六堵、五堵，再朝圖的右下角（地理方位之西方）而去，代表基隆河；另外從八堵分流的支流可能是大武崙溪。雞籠外海散布幾座離岸島嶼，其中一處繪有防禦設施，標明「雞籠汛」，與陸地隔著八尺門內海。圖左側（地理方向之東北）的三貂社為二河包夾，第一條河或指雙溪，上畫有一座橋樑，該是公司田橋。<sup>30</sup>第二條河則是壠壠溪，溪口畫有一艘船，在〈北基近傍圖〉與〈番社分布圖〉寫有「渡船」二字。<sup>31</sup>橋樑、船隻的標示，暗指此圖之交通取向，指引人群如何從五堵（界內）前往蛤仔難（界外）。

越過上述區域後即進入蛤仔難，其中卯裡嶺與大里簡間，有連串圓圈圖示，即史料所謂海口「暗礁鱗列」，代表路線的紅色虛線從礁石上通過。<sup>32</sup>大里簡與梗枋間標示「水流東」的溪流，意味著河水開始朝向東流淌，揭示了該圖中強調臺灣另一水文地理空間之開始。梗枋旁，〈番社分布圖〉上黏貼「此處生番出沒」標籤。<sup>33</sup>蛤仔難以四圍為中心，為網狀河流所環繞，用類似同心圓的方式向外輻射出七圈。四圍右下角開口，〈番社分布圖〉上標有「港口」二字，此港外海則有二個圓形標示「烏石」；〈海道圖說〉、〈北基近傍圖〉均畫有一艘船隻，〈番社分布圖〉上以二艘船隻表示。該港外側有一處離岸、孤立的區塊「馬隣州」，及另孤立於河道中的孤島，上標示著「哆羅美苑社」

<sup>30</sup>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卷3，頁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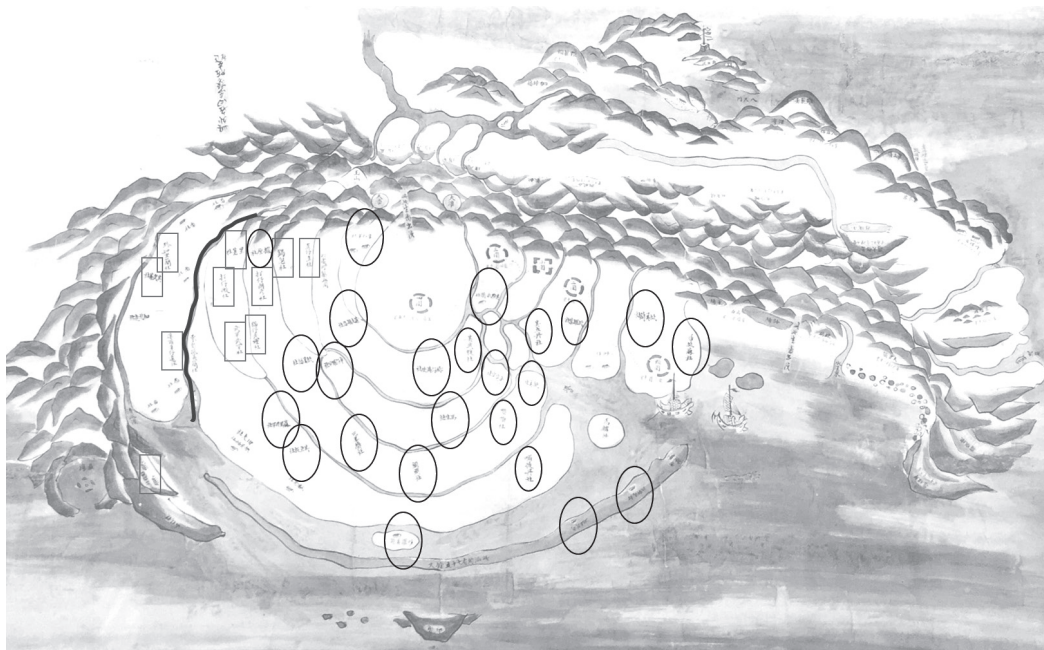
<sup>31</sup> 此渡口有可能是巖坑口渡、頂雙溪渡、遠望坑渡三者之一。由於過了雙溪後，最接近的河流為壠壠溪，而遠望坑即在該溪旁，因此最可能是遠望坑。參見陳培桂，《淡水廳志》，卷3，頁69。三貂社的位置，可參見溫振華，〈台北縣鄉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為例〉，《北縣文化季刊》，期43（1995年1月），頁35-36、轉45-48。

<sup>32</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46-147。

<sup>33</sup> 四圍旁，二處大潭中央也有同樣標示。

（〈番社分布圖〉寫「哆羅美苑」），可充為同心圓的第六圈。該「水道」為西勢大溪；水道外的則是可視為第七層為一片顏色較深的弧形沙洲。<sup>34</sup>

圖 4 〈番社分布圖〉的東、西勢番社標示



說明：筆者自繪。方框代表東勢番社，橢圓框則代表西勢番社。

南側有兩條標有名稱的河流：濁水與清水，二者的出海口幾乎匯流在外圍沙洲最南端。《噶瑪蘭廳志》稱：「濁水溪：嘉慶己巳（十四年，1809），正

<sup>34</sup> 蘭陽平原沖積扇在接近出海口前潛入地下，形成沼澤地帶，此水道外海則有堆積出來的沙丘綿延，史料稱打馬軒等社「依水傍山」，實是倚靠小山般沙丘、面對著西勢大溪的河道。參見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頁 12-15；李鹿萃，〈宜蘭平原土地利用的地理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研究報告》，期 3（1965），頁 28-57；林聖欽，〈宜蘭的河川與海洋、海岸線與港口〉，<http://www1.geo.ntnu.edu.tw/~t24010/100%E7%A0%94%E7%BF%92/%E5%AE%9C%E8%98%AD%E7%9A%84%E6%B2%B3%E5%B7%9D%E8%88%87%E6%B5%B7%E6%B4%8B.pdf>（2021 年 10 月 6 日檢索）。

溜北徙，與清水合流。至庚午夏，清濁攸分，仍循故道。」<sup>35</sup>照此，濁水溪原該在南、清水在北，與地圖不同；因此「清水」非指清水溪，而可能是相對濁水而言的清澈河流（尤其是平原上潛流冒出地表後的清澈水源），據地理位置或指今日冬山河。濁水用色較深，指今日蘭陽溪，將平原分隔成「西勢」與「東勢」的關鍵標示，〈番社分布圖〉繪製頗多的東勢、西勢番社，也可通過該溪的區分略見端倪（參見圖 4）。圖的最南端則是蘇澳，該處以圓形開口、中有魚群的方式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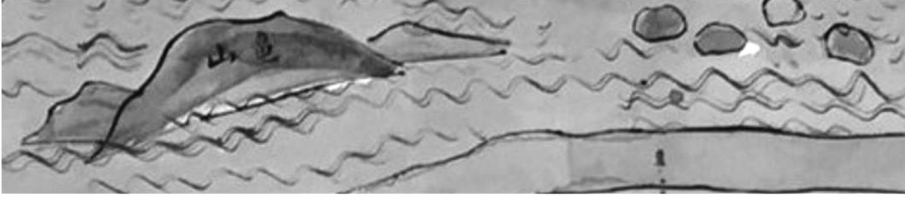
同心圓外，畫成三個山頭的龜山佇立海外，相較於〈蕭松友圖〉幾乎將之緊貼烏石港，〈海道圖說〉、〈北基近傍圖〉將龜山畫在沙洲左側外海，〈番社分布圖〉的龜山則被繪於中間處外海。但三幅圖的龜山右側，都有四個圓圈形狀圖示，意味著四座位於西南方、被稱為龜卵島的地方。<sup>36</sup>因龜山島由三座山頭組成，從不同角度觀看時，有可能龜首會被龜甲遮住，視覺上會認為整座島在轉向，以至於宜蘭地區有「龜山轉頭」的說法。若要看到圖中的樣貌，觀測點需由臺灣東北海岸處、約莫在今日大里簡一帶，往東南方向看去之角度（參見圖 5）。

<sup>35</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頁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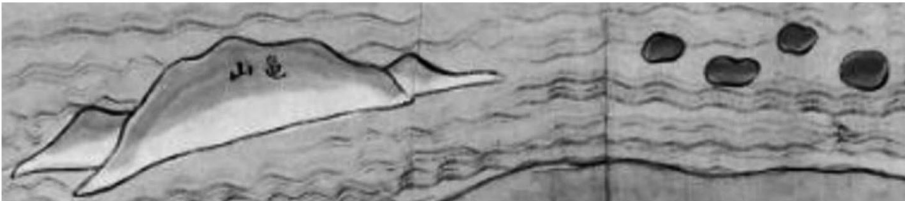
<sup>36</sup> 龜山島共計有三處山峰，龜甲山標高 398 公尺，龜尾山 141 公尺，龜首山則為 239 公尺。因此圖中左側山峰當為龜首，右側則是龜尾。

圖 5 龜山島圖比較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艋舺街至濁水海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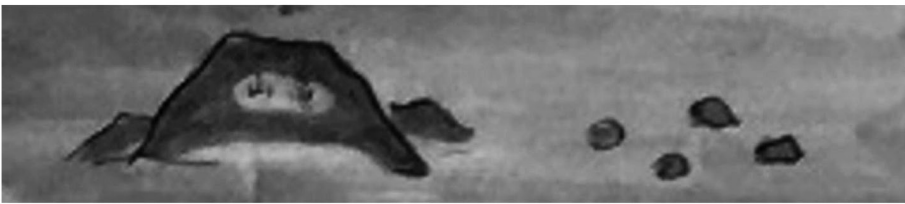


日本拍賣網站〈台北基隆近傍圖〉



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噶瑪蘭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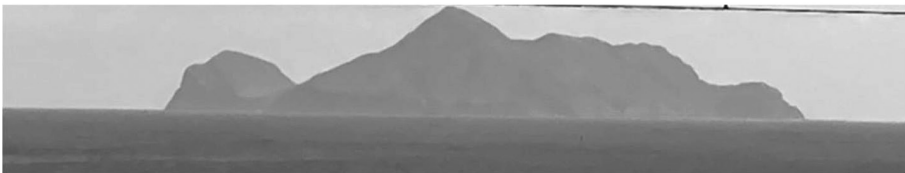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嘉慶年間噶瑪蘭番社分布圖〉



壠壠山望龜山島



大里天公廟望龜山島



說明：「壠壠山望龜山島」與「大里天公廟望龜山島」為筆者所攝。

除了漢人聚落外，四幅圖都描繪了數量不一的番社。〈蕭松友圖〉、〈海道圖說〉與〈北基近傍圖〉聚焦於濁水溪以北的西勢，東勢則僅有猴猴社被描繪。<sup>37</sup>〈番社分布圖〉不僅增加更多番社，範圍也擴大到東勢。<sup>38</sup>〈番社分布圖〉底圖雖有明顯變形，但基本筆法和整體視覺與另二圖一致。平原左下方的抵美福社與抵美社被劃去，抵美福社上被改寫為「旧大社」，二社均被移動到新的位置上：抵美福社新址在辛仔羅罕社隔河對岸，抵美社則是移至烏石港口南側，武蘭社也被改名為「其難武蘭社」。如此刪改和遷移，也證明繪製者在原圖基礎上的增補。扣掉被劃去、移往他處的二社、一處名為「東勢抵美簡」者，〈番社分布圖〉共標記 36 社。<sup>39</sup>現有資料並未說明抵美福、抵美社何時遷移到後來位置，不過，至少嘉慶十七年（1812）前，抵美福社的土地田產多已位於五圍旁的民壯圍壯二一帶。<sup>40</sup>

<sup>37</sup> 除新仔罕社外，二圖番社相同，全位於西勢地區，這些番社大多是長年和漢人有貿易關係的群體，雖然在文化與族群上仍有差異，但仍是通行廣義馬賽語之部落。由此可猜測，此圖同樣蘊含相當程度上的商業網絡意涵。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卷 10 期 1（2003 年 6 月），頁 1-32；簡宏逸，〈從蟒甲到社船：1650 年代至 1750 年代臺灣北迴沿海航路的商業活動〉，《臺灣史研究》，卷 27 期 4（2020 年 12 月），頁 1-34；李信成，〈清代噶瑪蘭族名制初探〉，《臺灣史研究》，卷 17 期 3（2010 年 9 月），頁 39-105；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收入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9-59。李信成則認為猴猴社約在 1730 到 1740 年代從立霧溪北遷，又受到南澳泰雅族群壓迫再次北遷，抵達蘭陽平原的時間在 1797 年左右，並於 1830 到 1850 年間進入南方澳，但在 50 到 60 年代逐漸噶瑪蘭化。參見李信成，〈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1（2012 年 3 月），頁 29-85。

<sup>38</sup> 〈海道圖說〉僅有二處標明「番社」，另外手書「此處三十餘社」；〈北基近傍圖〉則有一處；〈番社分布圖〉則標示了五處「番社」。

<sup>39</sup> 蛤仔難三十六社是自康熙年間開始對此區域的一種統稱，隨時間而有不同的指稱。番社多以漁獵為主，可移動性較大，這點也呼應了為何〈番社分布圖〉上兩處臨河、海的番社遷移到較靠近內陸之處。參見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頁 30-37。清代對於番社的登記，最為著名的是如稱阿里山八社、崩山八社等地域社群為賦稅單位熟番。參見詹素娟，〈賸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期 59（2003 年 11 月），頁 117-141；鄭瑩憶，〈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臺灣吳鳳信仰的形成〉，《歷史人類學學刊》，卷 12 期 2（2014 年 10 月），頁 57-58、〈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國史館館刊》，期 60（2019 年 6 月），頁 1-41。

<sup>40</sup> 嘉慶十六年（1811）吳袞觀、吳光裔等開墾抵美福水圳灌溉其立板新興莊（約位於今壯圍東港鄉），約位於臨海濁水溪出海口附近；嘉慶二十一年（1816）左右，漢人向抵美福購買坐落於大四圍附近的田產，該處鄰近濁水溪不過三里。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冊 7，頁 1190-1191；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歷史

此外，〈海道圖說〉、〈北基近傍圖〉對於東勢與西勢描繪偏差顯著，顯示繪者未將東勢視為讀者需理解之範疇，或是對於東勢的認識較少。又，除了雞籠汎外，界內範圍並未有其他官方設施，即便嘉慶十三年（1808）後已在地圖範圍內沿線設立汎塘，仍非繪圖者著重之處；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圖繪於嘉慶十三年前。<sup>41</sup>因此，〈海道圖說〉、〈北基近傍圖〉更接近蕭竹原始繪圖之情況，大概在嘉慶十七年以前，因應新需求而在圖上增添東勢番社，增繪了〈番社分布圖〉（參見表 1）。<sup>42</sup>

表 1 三幅圖中的番社與《臺海使槎錄》、《東槎紀略》、  
《噶瑪蘭廳志》、〈楊太守新圖〉比較表<sup>43</sup>

	〈海道圖說〉	〈北基近傍圖〉	〈番社分布圖〉	位置	《臺海使槎錄》	《東槎紀略》	《噶瑪蘭廳志》		〈楊太守新圖〉
							（土音）	（譯正）	
1	打馬軒	打馬軒	打馬軒	西勢	字馬氏	打馬烟	達瑪媽	打馬煙	打馬烟社
2			其直板		奇直板	奇立板	幾立板	奇立板	奇立板社
3			蘇里目罕			蘇里目罕	瑪嚕穆罕	蘇里目罕	蘇里目罕番社
4			擺厘		脾釐	擺離	擺立	擺離	擺離番社 擺離舊社
5			珍仔滿歷		賓仔貓力尾	珍仔滿力	賓那瑪拉	珍仔滿力	珍仔滿力社
6	抵美福	抵美福	抵美福		沈美閣	抵美福	都美鶴	抵美福	抵美福社
7			劉劉			流流	撈撈	流流	劉劉番社
8			蘇支鎮洛		麻里陳轆	蘇芝鎮	瑪立丁洛	蘇支鎮落	蘇芝鎮洛番社
9		奇仔罕	辛仔罕		須老員	新仔罕	新那罕	新仔罕	辛仔罕番社
10	抵美	抵美	抵美		抵密密	抵美抵美	美都美	抵美抵美	抵美番社

數位圖書館》，檔名：nrch\_cca100051-hm-od\_1560\_01-0001-i.txt。咸豐年間，大多數抵美福社的田產則坐落於壯二莊附近，該處離五圍（後噶瑪蘭城所在）較近，因此大抵可以推測，嘉慶十六年前抵美福主要聚落或仍在臨近海邊出海口處，之後逐漸移往噶瑪蘭城周圍。參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整理，《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藏古文書》，編號 T015。

<sup>41</sup>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7，頁 161。

<sup>42</sup> 或許這張圖的繪製和加留餘埔有關，相關討論可參見詹素娟，〈有加有留（ū ke ū lāu）——清代噶瑪蘭的族群土地政策〉，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13-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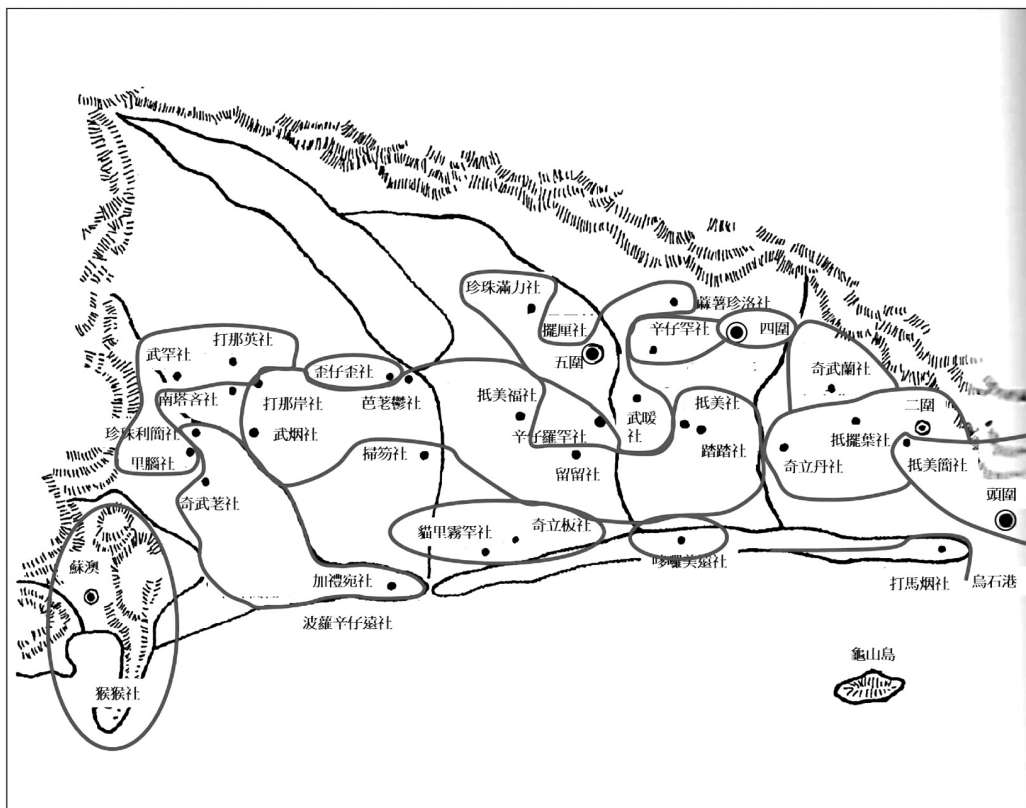
<sup>43</sup> 資料參考自 [清]黃叔燾，《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卷 6，頁 141；[清]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卷 3，頁 77-82；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2 上，頁 29-30。



11			踏踏		倒麥倒麥	踏踏	達普達普	踏踏	踏踏番社	
12			--		打鄰里	高東	貓乳	馬麟	馬陵番社	
13			--		礁仔墘岸	打那岸	哆囉岸	打那岸		
14			其武暖		奇武煖	奇武暖	幾穆蠻	奇武暖	奇武樓番社	
15	武蘭	武蘭	其難武蘭		期班女懶	奇蘭武蘭	燬魯蘭	奇蘭武蘭	奇蘭武蘭社	
16			辛仔囉罕		辛也罕	辛仔羅罕	新那嚕罕	新仔羅罕	辛仔羅番社	
17			其立丹		基密丹	棋立丹	幾立穆丹	棋立丹	其五州番社	
18			抵擺葉		八知買驛	抵把葉	都巴媽	抵把葉	抵把葉番社	
19			抵美簡		八知美簡	抵美簡	都美幹	抵美簡	抵美簡社 抵美簡舊社	
20	哆囉美苑	哆囉美苑	哆囉美苑			哆羅美遠	哆囉妙婉	哆囉里遠	哆囉美遠	
21			居抵麻							
22			奇免免		其沓沓					
23			囉拔丹		嘮拔丹					
24	奇武力	奇武力	奇武力		期尾笠					
25			加禮遠	東勢	佳笠苑	加禮遠	嘎里阿完	加禮遠	加禮遠社	
26		--				流流	留留仔	留留仔		
27		錫忽				削骨削骨	掃笏	沙豁沙豁	掃笏	掃笏番社
28		巴芼鬱				巴老鬱	芭芼鬱	巴撈屋	吧佬叻	
29		歪仔歪				歪阿歪阿	歪仔歪	外阿外	歪仔歪	歪仔歪社
30		貓仔武煙				貓嘮府偃	貓里府煙	瑪拉胡媽	馬芼武煙	貓劉武烟社
31		--					南搭吝	瑪魯煙	南塔吝	
32		武罕武罕				毋罕毋罕	武罕	穆罕穆罕	武罕	武罕社
33		打仔微				礁嘮密	打納美	達拉廩	打納米	打撈美社
34		打仔朗彥				礁轆軒	打那岸	達魯安	打朗巷	打朗巷社
35	猴猴	猴猴	猴猴			猴猴	高高	猴猴	猴猴新社	
36			--			其澤簡	里德幹	奇澤簡		
37			馬生		肉生				馬生番社	
38			東勢抵美簡							
39			其武芼	東勢配社	奇武流	奇武芼	幾穆撈	奇武芼	奇武老社	
40		里芼			了喏	里腦	里腦	里芼	里芼社	
41		婆囉辛仔遠			巴嘮辛仔員	婆羅新仔宛	巴嚕新那完	婆羅辛仔宛	婆囉辛仔遠社	
42			珍知里簡		陳雷女簡	珍珠美簡	丁魯哩幹	珍珠美簡	珍珠美簡社	
43				生番					叭哩沙喃生番社	

說明：《臺海使槎錄》中尚有八陳雷、賓耶知懶、礁嘮貓、毒龜晚、冬仔爛、劉簡、污泥肴等番社，未知所在；〈楊太守新圖〉中擺離舊社位於東勢、馬生番社位於西勢。

圖 6 〈番社分布圖〉與日本時期番社位置示意參照圖<sup>44</sup>



說明：筆者自繪。圖中圈線區塊所涵蓋的區域，為依照三幅圖中水文河流區塊為基礎所標示；底圖為伊能嘉矩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調查宜蘭平埔族番社所繪製的分布圖。

雖說〈番社分布圖〉更聚焦於東西勢番社的狀況，但路線指引作為核心目的之一，與另二圖並無二致，也是三圖和〈蕭松友圖〉之間最大差異。三幅地圖均標示相同、二條含里程數的紅色虛點「入蘭路線」：以五堵為起點，八堵為分叉點：一走陸路（內路）、一走沿海（外路），在丹裡庄會合，再前往三

<sup>44</sup>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の台灣踏查日記》（臺北：南天書局，1992），頁 274。

貂社、壠壠嶺、卯裡嶺等，入大里簡，沿海礁石而過，陸續通過頭、二、三圍，終點訂於四圍。<sup>45</sup>三幅圖的右下角皆以文字描寫通往蛤仔難內、外路：

內路：艋舺街至錫口街十二里，錫口街至水返腳一十里，水返腳至五堵八里，五堵至八堵一十五里，八堵至石碇湖七里，石碇湖至蛇仔形二十里，蛇仔形至三貂大嶺一十五里，三貂大嶺至丹裡庄三十五里，丹裡庄至三貂社五里，三貂社前遇渡至壠壠嶺十里，壠壠嶺至卯裡嶺二十里，卯裡嶺至大里簡十里，大里簡至梗枋一十里，梗枋至烏石港口一十里，烏石港口至頭圍八里，頭圍至二圍八里，二圍至三圍一十里，三圍至四圍一十里，四圍至五圍十二里，五圍至濁水溪一十五里。

外路：艋舺至雞籠頭五十里，雞籠頭至深澳二十里，深澳至八斗仔八里，八斗仔至跌死猴二十里，跌死猴至丹裡庄四十里合路。

文字、圖像上的停靠點略有不同（參見表 2）。文字說明之起點訂於艋舺，而非十九世紀前主要商業區域新莊街，亦非北臺灣政治中心竹塹，或與福州五虎門對渡的八里坌。雖然乾隆時代不少輿圖均以艋舺為地圖節點，但各圖均有各自脈絡，如本文稍後所欲探討的〈噶瑪蘭輿圖〉，即以新莊為出發點。因此，或許可間接證明，「官方視野」並非此三幅地圖焦點所在。

表 2 圖示與文字里程數、途經地點簡表

文字路線				圖繪路線				《蛤仔難紀略》道里	
內路地名		外路地名		內路地名		外路地名		道里	
艋舺街	--	艋舺街	--	五堵	--	八堵	--	艋舺	--
錫口街	12	雞籠頭	50	六堵	15	獅球嶺	N/A	錫口	15
水返腳	10	深澳	20	七堵		雞籠頭	N/A	水返腳	15
五堵	8	八斗仔	8	八堵		深澳	20	七堵	15
八堵	15	跌死猴	20	軟軟	7	八斗仔	8	蛇仔形	15
石碇湖 <sup>46</sup>	7	丹裡庄	40	石碇湖		跌死猴	20	武丹	20
蛇子形	20			四腳亭	20	菜公寮	N/A	丹裏	20
大三貂嶺	15			竭魚坑		丹裡庄	40	三貂社	10
丹裡庄	35			蛇子形				壠壠	5

<sup>45</sup> 雖此圖繪製時蛤仔難尚未被納入帝國版圖，但本文仍以「入蘭」一詞稱之。

<sup>46</sup> 圖中的「石碇湖」，應是指碇內。

三貂社	5			大三貂嶺	15			卯裏嶺	20
壠壠嶺	10			丹裡庄	35			大溪	15
卯裡嶺	20			三貂社	5			梗枋	10
大里簡	10			壠壠嶺	10			烏石港	10
梗枋	10			卯裡嶺	20			頭圍	4
烏石港	10			大里簡	10			二圍	8
頭圍	8			梗枋	10			三圍	10
二圍	8			烏石港	10			四圍	6
三圍	10			頭圍	8			五圍	10
四圍	10			洲仔	8			民壯圍	5
五圍	12			二圍				大四圍	6
濁水溪	15			三圍	10			濁水溪	3
				小圍				溪洲	5
				四圍	N/A			羅東	20
								打哪美社	5
								珍珠里簡社	15
								奇五莖社	15
								新猴猴社	15
								蘇澳	15

「外路」的文字描述經過雞籠頭、跌死猴等地；但圖上紅色虛線所標示沿途經過地點，卻在過了雞籠尖、抵達八斗子後，轉往山區菜公寮、丹裡庄，避開沿海區域（包括草山嶺、跌死猴），暗示沿海地區並非繪圖者和其背後集團所能掌握，亦符合鄭螢憶對於三貂區域的研究狀況。<sup>47</sup>然而，〈番社分布圖〉的路線卻直接經過沿海區域，可知該圖的繪製與另二圖有時間上的差異，也正因此時間差路線上有所更動，地圖所呈現的就是控制此區域「集團」所願意「公開」出來給有意入蘭者的行經路線。<sup>48</sup>路線連結著界內、界外，其文化意涵正如鄧津華 (Emma Jinhua Teng) 所述，清帝國甫併入臺灣時，不僅是帝國本身，

<sup>47</sup> 根據鄭螢憶的研究，此時沿海地區擁有者與吳沙集團屬於不同的群體。參見鄭螢憶，〈北臺灣三貂社的族群互動與海岸社會變遷（1685-1920）〉，《歷史人類學學刊》，卷 20 期 2（2022 年 10 月）頁 85。

<sup>48</sup> 根據姚瑩〈臺北道里記〉，三貂嶺「在楊廷理新開路東，因其路迂遠，人不肯行，故多由此舊路云。」此處所指「舊路」為草嶺古道，在楊廷理開拓以前就已經存在，而二條路線的交會處在今日牡丹一帶，該處也早已修築了民壯寮，「守險於此，護行旅以防生番也」，而民壯寮即為吳沙拓墾集團所設。因此，所謂的楊廷理古道，不過就是楊廷理依據此圖、而此圖的路線則是吳沙等人所釋出給予官方和大眾入蘭的唯一路線。參見〔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15，頁 397、〔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91。

即使是旅行者、官員等「殖民書寫」將之與江、浙通過「交通」進行連結，有異曲同工之妙。<sup>49</sup>若依此，則可發現三圖蘊含此連結隱喻，但〈蕭松友圖〉中並沒有。

據前所述，可發現幾個狀況：其一，路線可被切割成兩段：內路、外路是從艋舺（或五堵）通往丹裡，再由丹裡到四圍。所謂的內外路之差異，僅是製圖者在告訴閱讀者，無論採取哪一條路徑，都必須以無可取代的丹裡為進入蛤仔難的起點。其二，蛤仔難的最後一處民莊是四圍，並在旁圈選一處註明「此處可築五圍」；可推斷成圖時間約在嘉慶四年（1799）四圍已築，到嘉慶七年（1802）九旗首修築五圍間。<sup>50</sup>換句話說，相較於〈蕭松友圖〉中還有嘉慶十二年以後的知識，〈海道圖說〉與〈北基近傍圖〉更加體現這一段時間的內涵，且據以丹裡庄為入蘭起點、以四圍為西勢中心、聚焦於交通路線、具有蛤仔難經驗等特點，可能的繪製者是與丹裡庄關係密切的漳籍吳沙拓墾集團。<sup>51</sup>

謝金鑾在撰於嘉慶十二年的《蛤仔難紀略》中，曾描述四幅他曾過目的蛤仔難地圖，分別是《諸羅縣志》圖、徐夢麟圖、蕭竹圖、楊廷理圖。<sup>52</sup>其中淡水同知徐夢麟僅依傳聞畫製，其圖僅大略形制，因此「三港失其形勢」，<sup>53</sup>甚至把「玉山」畫在蛤仔難的西北處，較無參考性。其餘三幅則頗值得細細探討。嘉慶五年，漳州龍溪人蕭竹因善堪輿之術，受「吳沙」邀請抵達蛤仔難，完成了在臺灣流傳最廣的圖繪。<sup>54</sup>該圖著重四圍，位置坐乾向巽（坐西北朝東南），

<sup>49</sup> 可參見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4-59, 87-100.

<sup>50</sup> 「九旗首」指「漳人吳表、楊牛、林碩、簡東來、林胆、陳一理、陳孟蘭，泉人劉鐘，粵人李先」等。參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7，頁 372。

<sup>51</sup> 吳沙即葬於丹裡庄，今日澳底地區。

<sup>52</sup> 楊廷理於《紀略》的〈序〉中提到：「慮三圖之惑後觀，故作〈圖說〉。〈形勢〉、〈道里〉，以輔圖也。」而謝金鑾自述中則提及四幅圖。〔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9-180。

<sup>53</sup> 謝金鑾所謂「三港」之說，因為在〈楊太守新圖〉、〈噶瑪蘭輿圖〉與《諸羅縣志》三圖都繪有烏石、加禮宛、蘇澳三處河港；唯本文所分析的三幅地圖和〈蕭松友圖〉僅繪有烏石、蘇澳二港。

<sup>54</sup> 《噶瑪蘭廳志》載，蕭竹於嘉慶五年到此；又有記載稱蕭竹於嘉慶三年抵達臺灣，三年後抵達蛤仔難。姚瑩也觀察到這個差異，因此認為款待蕭竹的人並非嘉慶二年已經去世的吳沙，而可能是吳沙之子吳光裔或姪子吳化。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頁 18、卷 8，頁 413-414；〔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72。

最特別之處在於「圖方向大異」，與三幅圖方位坐西北（五堵）朝東南（四圍）吻合；除了謝金鑾描述「後山之疊脈，水法之迴抱」符合三圖特點外，對此圖也提出正面的評價。蕭竹的〈甲子蘭記〉提到：「千山競秀，萬水朝宗，內納一大陽基，通蘭眾再造四圍，聊題詩記圖說。」提及的地景，包括「長堤」、「猴山」、「滄海」、「龜嶼」、「玉山」，及所謂「羅紋交貴水纏流，屏峯錦帳列千尋」等，均是地圖展示的重點。<sup>55</sup>

誠然，《蛤仔難紀略》中，如金面山、「頭圍居海口，北倚山，其南為烏石港」、烏石港到二圍沿山而行，之後往南到三圍、及「三港」等描述，都是新的地理知識而與三幅地圖不同。然而，不少地方均可見謝金鑾仰賴蕭竹圖所書寫文字的痕跡。如蛤仔難地勢「三面皆山如環，而缺其一也」，即點出蛤仔難山脈圍繞數環重疊，並且開有一處缺口的特色。其次，提及濁水溪、清水溪最終匯流：「其南有清水溪，末流與濁水合；北亦有溪，三溪源皆出內山，東流注於海，《諸羅志》所謂三港合流是也。」雖說三港合流，但《紀略》僅提到該處二港：「海口北山東盡為烏石港，南山東盡為蘇澳。」又，《噶瑪蘭志略》中所收的《蛤仔難紀略》描述龜山島位於東面大海，然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則增加與三圍相對的說法，<sup>56</sup>這與〈海道圖說〉、〈北基近傍圖〉相同，與〈蕭松友圖〉位於烏石港外有所不同，<sup>57</sup>亦與〈番社分布圖〉和隨後的〈楊太守新圖〉及〈噶瑪蘭輿圖〉龜山位於沙汕外有所不同。<sup>58</sup>又〈原由〉一篇稱：「陸路由三貂入。初徑險，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後漸闢以廣，然闐寂無人，生番伏路，行者多中傷。」<sup>59</sup>與〈海道圖說〉、〈番社分布圖〉上「此處生番出沒」標籤相同。

<sup>55</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頁 18。

<sup>56</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中國國圖本），頁 10。

<sup>57</sup> 《重纂福建通志》中則延續烏石港外的知識：「又治西有烏石港，與海中龜嶼相對」。參見[清]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程祖洛等續修、魏敬中續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福建》（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卷 86，頁 31。

<sup>58</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5-166。

<sup>59</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1。

謝金鑾〈原由〉稱蕭竹繪圖時「未有五圍、六圍者」，因而在其圖中圈選「建圍之地」，故三幅圖均標註「此處可築五圍」，〈蕭松友圖〉則僅稱「此處可圍城」，並未更具體。<sup>60</sup>蕭竹繪圖完成後，「吳沙」隨後：「乃陰以圖求敢言於當事者得奏報升科，願出賦為請設官建署。」<sup>61</sup>考量到〈圖說〉中繪圖內容和時間斷限，及特別標示與吳沙據點丹裡、關於蕭竹圖的密切關係，三幅圖該是蕭竹在嘉慶五年地圖之衍伸產品，雖然我們無法肯定是否這就是當時所繪之圖，但至少知道此三幅圖與〈蕭松友圖〉應該共享同一原始圖資。除了與五圍選地有關的目的外，更重要的目的或是用來勸說官府答允拓墾蛤仔難入界之用，也代表需要多份地圖給予不同官員，因此在臺郡流傳最廣；這可解釋為何現在會有多幅版本存世。<sup>62</sup>

從上文論述可知，〈蕭松友圖〉被收入《蛤仔難紀略》時，應該經過某種程度的壓縮、增添、重製，相較而言，三幅圖可能更接近蕭竹於五年所繪的原始底圖。〈蕭松友圖〉與另外三圖最關鍵的差異在於是否涵蓋非蛤仔難地區，以及通過標記路線串連界內、界外。路線上又可分二段，第一段為從艋舺（圖上標示為從五堵）前往丹裡，第二段路線則是從丹裡前往蛤仔難地區。再加上如龜山島形制為從西北朝東南觀察的視角等，可知蕭竹之圖有二個核心：一是臺灣東北海岸，一是以蛤仔難四圍為中心。〈海道圖說〉與〈北基近傍圖〉有極高的相似性，〈番社分布圖〉則是重新描繪並添補嘉慶六年（1801）到十七年間的番社知識，以供其他用途。隨後，基於三幅圖之原始底圖（以下將概稱為蕭竹圖）的另一副本被簡化並最終附於《蛤仔難紀略》送予臺灣、北京官員瀏覽。地圖往往由繪製者（map-makers）、測量人員（surveyors），創造了邊疆（border），揭示權力結構。對於帝國而言，地圖定義「界內之人」（people

<sup>60</sup> 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頁 18；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下略編者），《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冊 117，頁 350。

<sup>61</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卷 11，頁 1477-1478。

<sup>62</sup> 謝金鑾即是在嘉義任教諭時，由好友陳作哲處得見蕭竹圖。參見〔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4，頁 206-207。

inside) 和「界外之人」(people outside)，然而蕭竹的圖卻完全顛覆了地圖編寫的進程：是由界外人士主動編繪，反向提供給界內的官員和帝國重新定義邊疆。<sup>63</sup>換言之，帝國透過各種人群（旅行者、官員、殖民者）積累知識以鞏固對遙遠邊區的控制；與此同時，被調查的邊疆地區同樣在挑戰帝國主導整起地圖邊疆繪製的地位。<sup>64</sup>從此觀點來看，蕭竹作為一個遠赴界外的旅行者，除了擴大既有的地理空間認識，也提供想像地理的嶄新面貌。

### 三、何人所用？請墾的地方與再利用的中央

當蕭竹抵達蛤仔難時，吳沙實已去世，因此請蕭竹繪製地圖者該是吳光裔等開墾集團領導者，其目的之一是提供參考、指南以便向官方勸說陞科。<sup>65</sup>陳南旭在探討官員與拓墾集團、資金挹注者關係時，認為趙隆盛、柯有成等淡水商紳及官員楊廷理、謝金鑾與鄭兼才等是促使清帝國納入蛤仔難的關鍵人物；某種程度上暗示淡水商紳、拓墾集團和臺灣官員合作達成此一帝國拓展進程。<sup>66</sup>自嘉慶二年（1797）吳沙初次請求給札招墾直到嘉慶十七年噶瑪蘭入版圖，漫長的十五年間，許多決策和人員都與「圖」有關係。例如，蕭竹繪製的地圖、謝金鑾閱讀過數幅地圖、楊廷理自番社處獲取地圖（或自行繪製）、<sup>67</sup>梁上國（謝金鑾提供）、汪廷珍、辛從益（皆鄭兼才提供）都曾閱讀《紀略》

<sup>63</sup>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June 1998), pp. 263-286. 用地圖來區分界內外，福康安亦有類似的觀察：「臣福康安追勦賊匪時周歷全郡，所過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輿圖定界之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奏疏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頁 53。

<sup>64</sup> 相關論述可參見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65</sup> 雖然不少資料指出吳光裔「無能」，其後較具分量者是吳沙族姪吳化與其他人，但為求行文方便，仍以當時多數資料所稱的吳光裔為主要領銜者。參見陳淑均，《噶瑪蘭志》，卷 7，頁 370-374。關於吳光裔，可參見許雪姬，〈宜蘭開發史事探微——吳光裔事蹟考〉，《臺灣風物》，卷 31 期 3（1981 年 9 月），頁 31-42。

<sup>66</sup> 陳南旭，〈經貿發展與臺灣邊疆的變遷：十九世紀之交的蛤仔難〉，《國史館館刊》，期 61，頁 1-41。

<sup>67</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5；[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1，頁 36。



和附圖、<sup>68</sup>福州將軍賽冲阿也曾讀過一幅圖並附於奏摺、汪志伊在嘉慶十三年提供一幅地圖、十六年奏報時也曾查閱了淡水輿圖，並附上一幅噶瑪蘭圖給皇帝參考、汪志伊於十六年的〈勘查開蘭事宜狀〉也提到「並繪具輿圖貼說」。<sup>69</sup>即便存在如此多和地圖有密切關係的事實，但過往研究並未把地圖與進呈者置於討論中心。本節將從官員人脈網絡與地圖傳遞、使用，論述嘉慶年間地圖的再利用是兩批人群與各自擁有的官員網絡、整體政治局勢互動所致。

吳沙進入蛤仔難乃「迎外入者，且通有無」。<sup>70</sup>嘉慶二年，吳沙「恐以私墾獲罪」，請求淡水同知何茹連允許開墾西勢；四年，吳光裔會同五名董事以「蘇長發」之名，赴福州的布政使衙門請求署福建布政使劉斌給照開墾。<sup>71</sup>劉斌署職結束後，接替其職務者為李殿圖在該年十一月與劉斌共同回報了前一年福建各地官紳民人捐輸穀石的狀況。<sup>72</sup>劉斌雖擁有豐富福建政務經驗並且曾著力於米穀捐資，仍謹慎地要求臺灣知府吳逢聖和淡水同知李明心調查審議。<sup>73</sup>然而，吳、李二人均反對此一請求；李長森因此依據新任臺灣道馮昌的最終決

<sup>68</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8，頁377-378。

<sup>69</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31-150、[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頁333-3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下略），《明清史料·戊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3-1954），第6本，頁549。

<sup>70</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中國國圖版），〈原由〉，頁2。

<sup>71</sup> 雖然楊廷理稱當時福建布政使為「劉藩憲斌」即劉斌，但當時任此職者實為李殿圖；不過同時亦有劉斌在嘉慶三年四月到四年八月間擔任福建按察使，並且署職布政使。參見[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7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卷11，頁1444-1446；[清]曹振鏞等奉敕修（下略），《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版本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實錄資料庫」，本文皆同），卷29，頁344、卷50，頁639；包發鸞、趙惟仁纂修，《南豐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卷16，頁20。袁秉義與楊廷理等人都是在福康安擊潰林爽文後，對臺灣的規劃部署中舉派的第一批治臺官員。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下略），《明清史料·己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958），第9本，頁839、第10本，頁997-998；〈福康安等奏為陞調海外同知通判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下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以下簡稱《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32418。

<sup>72</sup>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01550。

<sup>73</sup> 李明心，字孔昭，號鏡涵，貴州興義人，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李明心在四川隆昌任職時致力於減少徭役。參見劉顯世、谷正倫修，《貴州通志》（成都：巴蜀書社，2006），〈人物志五·清三·政事上〉，頁68。

議撤案。<sup>74</sup>六年，吳光裔偕同何繪、趙隆盛、柯有成等人前往臺灣府城，尋求遇昌支持；且這時布政使為李殿圖，他與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起，二任淡水同知、二任臺灣知府袁秉義為同年進士、同鄉好友。<sup>75</sup>或許基於這幾層關係，吳光裔等有此次陳請；但即便如此，他們首先尋求的是臺灣最高行政長官、前一年依淡水同知建言做出決議的遇昌之支持。遇昌曾出任臺灣知府，於臺灣有深刻認識，仍依據過往經驗令時任淡水同知的吉壽審查此事。<sup>76</sup>七年（1802），吉壽援引李明心四年決議再次否決。據此可發現，無論是福建布政使、臺灣道等高級行政官員，他們最終都是徵詢鄰近蛤仔難的淡水同知方做出最終裁決，而且兩次反對的依據意見均來自李明心。

李明心在這四、六年的陳請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有限史料可略推測李明心的想法。嘉慶三年，北臺灣有叛黨滋事，李明心派兵搜捕處置，擔心「途長嶺峻，早晚聲息難通」。<sup>77</sup>五年，海盜侵擾八里坌，李明心修建柵欄，守護口岸、派軍防範大雞籠。<sup>78</sup>即是在這段陳請陞科的時間裡，他設法穩定危機四伏的社會秩序。相較於此，在收繳糧稅上，李明心顯得較有餘裕，即使嘉慶四年李明心與官員因無法提供足額的錢糧，被罰降職一等；但已是受罰程度較輕者。<sup>79</sup>省視李明心反對納入蛤仔難理由是：「蛤仔難遠在淡水、三貂以外，距

<sup>74</sup> 楊廷理雖然說這時最終批准銷案者為李長森，並稱他為「藩憲」，但此時李長森的職位該是福建鹽法道，而非布政使。

<sup>75</sup> 袁秉義在淡水同知任內與趙隆盛、柯有成等人多有接觸袁秉義與地方社會多有互動，曾參與修建城隍廟與鄰近的廳署及內天后宮的官方媽祖廟之修建。新莊慈祐宮的祀田問題也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袁秉義立碑，當時主導該宮事務者即包括後來趙隆盛等人。參見〔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3，頁 51、卷 6，頁 149-150。〔清〕鄭鵬雲、〔清〕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卷 3，頁 107；邱秀堂編著，《臺灣北部碑文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頁 140，〈天后宮祀田區〉。

<sup>76</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下略），《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1995），輯 1，頁 418。

<sup>7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合編，《天地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0年），冊 6，頁 78-79。

<sup>78</sup> 《明清史料·戊編》，第 5 本，頁 463-465。

<sup>79</sup> 當時較他受罰為輕者僅有臺灣縣知縣周祚熙、福州府同知汪楠，其餘如福建布政使李殿圖、前任布政使汪志尹、臺灣府知府遇昌等人，都因為積欠更多的錢糧而受到更加嚴重的懲罰。此時管理戶部三庫事務者，正是與洪亮吉友好、蔡新的學生和碩成親王永理。〈戶部為臺灣府屬嘉慶二年地丁錢糧奏銷事〉，《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00758。

淡城五百里，深林密箐，疊嶂重巒，鳥道紆迴，人跡罕至，三十六社生番性同梟獍，勿許便。」<sup>80</sup>換言之，李明心任職淡水同知時，正值海盜亂事、地方叛亂頻發，這些讓他疲於奔命的狀況很可能隨著開拓蛤仔難而加劇；相較而言，主張開拓蛤仔難期待提高米穀產量，但對並未面臨嚴峻糧食、稅收問題的李明心而言未有極高吸引力，反而潛在壞處大於益處。

嘉慶八年（1803）時，當拓墾集團之陳請屢次遭拒後，一名為「蔡必發」者懇請拓墾蛤仔難：該墾號為已故大學士、漳浦人蔡新族侄所組織。<sup>81</sup>蔡新，福建漳浦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五十年（1785）致仕後仍與乾隆皇帝密切聯繫，關注海盜與米價問題。<sup>82</sup>蔡新多次任考官，許多徒子徒孫在臺灣任職。當蔡必發請墾時，其弟子們幾乎佔據了決定是否開拓蛤仔難的第一線位置，例如接替吉壽的新任淡水同知是由與蔡新關係密切的李殿圖推薦、蔡新之學生胡應魁，當時福建布政使為裘行簡、臺灣知府慶保亦是其學生。<sup>83</sup>淡水同知雖在

<sup>80</sup> [清]姚瑩，《東槎紀略》，頁 72-73。

<sup>81</sup> 由於楊廷理在〈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提到：「旋有假托蔡中堂新族姪蔡必發者，赴裘藩憲行簡呈請報陞」，可知這時福建布政使是裘行簡，因此蔡必發前往懇請時當是嘉慶八到九年間；依照楊廷理行文結構，九年尚有廣東人士徐春芳等人依附羅東番人之事，因此蔡必發前往福建當是八年。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7，頁 366-367。

<sup>82</sup> 林爽文事件期間，皇帝表示朝中沒有人有如蔡新才學可討論古文，在給蔡新的信中寫道：「聞卿家居，戒飭族眾，甚屬安靜，朕甚嘉之。」參見[清]慶桂等奉敕修（下略），《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版本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實錄資料庫」，下同），卷 1274，頁 49、卷 1360，頁 237。例如乾隆六十年（1795）有關督撫等貪贓枉法但蔡新家居未及奏聞，被交部議罪，但為皇帝所原諒；又嘉慶元年談及福建海盜事務。《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92，頁 963；《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頁 90；《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輯 5，頁 686。嘉慶五年蔡新病故，八年福建巡撫李殿圖奏請將蔡新入祀鄉賢祠，《清仁宗實錄》，卷 60，頁 800、卷 121，頁 618。其子侄們屢屢登科、在朝為官，除了蔡新之子蔡本俊於嘉慶四年中進士、其孫蔡行達也是嘉慶六年進士。《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冊 74，頁 251；[清]李維鈺原本，[清]沈定均續修，[清]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 19，頁 7；《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44，頁 533、卷 83，頁 76。

<sup>83</sup> 嘉慶六年起慶保署臺灣知府，此前是福建督糧道，負責督運福建收糧、督押糧運、管理水利等事務，並在嘉慶二年至臺灣處理糧食問題，此職務於嘉慶十二年裁撤。〈福建巡撫為交代錢糧事〉、〈為臺灣澎湖被風等事〉，《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02820、231894；《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50，頁 801；《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71，頁 682；[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卷 258，頁 8-9。其同年尚有蔡新學生高叔祥、周祚熙等隨後曾在臺灣擔任要職者。胡應魁於嘉慶元年任彰化縣知縣，八年署淡水同知，十一年任嘉義縣知縣後又任淡水同知。《明清史料·戊編》，第 7 本，頁 631；《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冊 102，頁 385-389。

決定批准請墾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絕非一人就可做出決定。一如拓墾集團的做法，「蔡必發」前往福州尋求福建布政使裘行簡的支持；裘行簡之父裘曰修和蔡新既是同僚也是好友。即是說，「蔡必發」擁有福建、臺灣官場上、下、朝廷中樞等不同層級的官場網絡。同時，「吳姓人」也攜帶「無地名四至之墾單」，前往曾交涉過的福建巡撫李殿圖與臺灣道遇昌處懇請；而二人當初反對的原因均是因淡水同知最終的建言。<sup>84</sup>因此，嘉慶八年蔡必發的出現，不僅是陳南旭所論米糧價差產生的市場需求所出現的產物，也因當時官場人脈環境是最為適合，也最可能達成陳請要求的時刻。與此同時，曾在林爽文事件時期與吳沙集團間接往來、且多年在臺灣任職的楊廷理恰巧返回廣東。

楊廷理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抵臺擔任同知，林爽文事件期間先後兼理、實任臺灣府知府，隨後更負責總理各路軍餉。戰爭期間福康安派「徐夢麟由三貂至內山率生番橫截蛤仔難」，楊廷理方知：「有三貂、蛤仔難之名。」並大概從徐夢麟等人口中得知吳沙等人久住於三貂。<sup>85</sup>事件平定後，徐夢麟倡議將蛤仔難納入疆界，但新任福建巡撫徐嗣曾因該處屬界外，「恐肇番衅」而反對。楊廷理在臺任官直到嘉慶元年（1796）被免職、流放伊犁。<sup>86</sup>嘉慶二年正月十五日抵達伊犁，直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方離開，經歷前往北京的漫長旅程後，最後回到位於廣州的寓所。<sup>87</sup>次年，他先回柳州後再回到廣州，並在十月

<sup>84</sup> [清]楊廷理，〈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收入[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3-179；[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72-76。

<sup>85</sup> [清]鄭鵬雲、[清]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卷 5，頁 206-207；[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3。

<sup>86</sup> 楊廷理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因受海口出入船戶陋規銀兩事件被發往新疆效力，但最終僅革職，留任臺灣八年。此後，楊廷理在臺灣屢破大案，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賞加按察使銜。直到嘉慶元年，因私刻年譜與虧空穀倉獲罪，謫戍伊犁。參見《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4，頁 101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癸集，頁 74-75；《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輯 18，頁 518。

<sup>87</sup>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楊廷理方才期滿被釋放回籍，並於該年四月三日出發，原先預計六月返抵京師，遲至七月十日才抵達北京，停留到八月十三日後，離開北京南下廣州。該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達位於廣州的寓所。返回廣州的路上，受在臺灣的同僚清華之邀相處多日，詩文唱和。參見《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冊 101，頁 228-230、319-322。[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6，頁 6-8、頁 19、28。

十九日在廣州寓所收到來自府城商人的協助，繳納欠款、捐官。<sup>88</sup>也許爲了與資助者接洽，十年（1805）閏六月十四日楊廷理北上，途中停留廈門，在此「得悉大概」，並強調當時尚不知賽沖阿有「該處膏腴爲蔡逆窺伺」之奏。<sup>89</sup>十一年（1806）年初楊廷理抵達北京，不久即以「捐商籌納」，並在七月十一日面見皇帝。<sup>90</sup>該年九月，甫任臺灣知府的高叔祥去世，<sup>91</sup>同月二十日，皇帝決定讓熟悉臺灣的楊廷理補授臺灣府。嘉慶皇帝表示：「再朕聞淡水滬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爲該逆素所窺伺。此時或又竄往，亦未可定。賽沖阿可派兵前往，相機辦理。」<sup>92</sup>楊廷理在臺停留初期，對蛤仔難認識不深；嘉慶十一年卻可侃侃而談、陳述關於蛤仔難的事情，讓嘉慶皇帝印象深刻，很可能是因爲前一年在廈門得到來自臺灣的捐資人群之消息。<sup>93</sup>

被任命爲知府後，楊廷理隨即前往臺灣處理海盜朱潰入侵蛤仔難這個第一要務。<sup>94</sup>他從艋舺出發，到了錫口街後：「中歷蛇仔形、三貂、隆隆三大嶺，過谿三十六里，危險異常，生番出沒，人多畏之。」<sup>95</sup>《蛤仔難紀略》的〈道里〉記載楊廷理入蘭之完整路線，並在之後被稱爲「正路」，其停靠點均與蕭竹圖所示的路徑重疊。<sup>96</sup>擊敗朱潰後，楊廷理稟請賽沖阿設官經理，但被拒絕，並要求楊廷理返回府城。賽沖阿重視海疆防禦，但不贊同殖民拓墾。<sup>97</sup>建言被

<sup>88</sup> 〈十月十九日得臺灣公助信志感〉詩云：「從今不敢薄貲郎，鉢託經年總未償。僅了官逋仍匱乏，重尋臣轍待商量。休嗤貧仕皆謀食，能解趨公肯遜藏。多謝故人傾助力，秋蘭綉處裊新香。」詩句中提到鉢託、官逋，意指他在侯官、償還臺灣歷年積欠之款項，得到來自「故人」，包括許多臺灣友人的幫助，並且捐官。〔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卷6，頁32-33。

<sup>89</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頁367；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卷7，頁1-4。

<sup>90</sup> 〔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卷7，頁5-8。

<sup>91</sup> 高叔祥在嘉慶十一年二月到任，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9本，頁892。

<sup>92</sup>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158，頁39。

<sup>93</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頁367。

<sup>94</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83。

<sup>95</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8，頁389。

<sup>96</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66-167、卷14，頁196。

<sup>97</sup> 嘉慶十一年正月賽沖阿奉命節制閩海，重視海疆防禦，例如從財務上改革福州駐防八旗與水師之操練；又嘉慶十二年二月，賽沖阿建議將鳳山移回舊城加深海疆防禦；嘉慶十三年也在滬尾增派大軍。但他不贊同殖民拓墾，例如嘉慶十七年四月，擔任吉林將軍的賽沖阿奉皇帝之命調查吉林地區是否有空地可以供多餘的八旗人丁開墾，賽沖阿報告當時阿勒楚喀城臨近的拉林、夾信子溝有地可供拓墾，但以「距離過遠」與「吉林近年收穫不佳」，建議暫緩遷移旗人開墾。

拒後，楊廷理從蛤仔難「繪圖而出」，抵達臺灣府城後，「奉旨掣回」，因而「面陳形勢，請開益力」。<sup>98</sup>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時任少詹事的梁上國在拿到《蛤仔難紀略》後，上奏力陳納此區域。<sup>99</sup>雖說詹事職掌是編纂書籍等，但也是培育中央官員的人才儲備所，有清一代曾充當過詹事或少詹事者共 616 名，其中有 463 名在詹事後曾擔任侍郎、210 人曾充當尚書，有 113 位有過服務於軍機處的經驗。<sup>100</sup>翰林院、詹事常是皇子教師甚至帝師，因此在政務上發言頗具分量。在商議納入蛤仔難時，朝中最重要的翰林之一是時任經筵講官、尚書房總師傅、禮部尚書與戶部三庫事務的王懿修。<sup>101</sup>王懿修為楊廷理之師，二人關係密切，甚至當楊廷理流放伊犁時，依舊與王懿修等人詩文、書信往來。<sup>102</sup>

此外，王懿修之子王宗誠時任詹事與梁上國共事；在上奏前夕，王宗誠之母去世，理該返鄉扶柩，但卻以王懿修年老為由，請求留京師。<sup>103</sup>雖然尚不知

---

參見〈兵部為賽沖阿奏遵旨保奏守城禦賊出力各員事〉，《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91949；《國史大臣列傳次編》（國立故宮博物館藏，清內府朱絲欄寫本），卷 144，冊 61，檔案號故殿 011580；《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輯 17，頁 861。

<sup>98</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7，頁 367；《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79，頁 356。

<sup>99</sup> 在密詔立儲的清代，詹事府已不再與東宮太子有關。乾隆四十一年（1776）規定，文淵閣由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主持閣務，直閣事者則從內閣學士、滿、漢詹事、滿、漢少詹事、翰林院讀講學士共六人充當。[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9，頁 5、卷 18，頁 8。據《清史稿》載，詹事與少詹事職責為：「掌文學侍從。經筵充日講官。編纂書籍，典試提學，如翰林。並豫秋錄大典。」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15，頁 3313。此一數據為筆者自「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統計之結果。

<sup>100</sup> 王懿修，字仲美，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選庶吉士，曾任多省鄉試正、副考官、日講起居注，五十四年（1789）因病休養。嘉慶七年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次年任禮部右侍郎，同年轉任禮部左侍郎，十年五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閏六月改任禮部尚書，十一年十二月擔任經筵講官，十二年十月充當上書房總師傅，十四年擔任會試正考官，十八年致仕。參見《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102，頁 372、卷 116，頁 550、卷 124，頁 667；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51，頁 11268-11269。

<sup>101</sup> [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卷 1，頁 19、23、卷 2，頁 33。林爽文事件後，乾隆撰〈平定臺灣聯句〉，侍讀茅元銘曾於相關詩句中註明過往臺灣道、知府之缺由巡撫、總督建議，因此常有徇私。此後改以吏部奏請皇帝，展現「官方至意」，派遣能幹大臣，或指新任臺灣知府楊廷理。[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 35，頁 18-20。

<sup>102</sup>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04，頁 723-724。王宗誠，字中孚，王懿修獨子，乾隆五十五年探花，同年中式者還有楊廷理好友、且曾一齊發配伊犁的洪亮吉及時任福建巡撫的張師誠；曾任多省鄉試正、副考官，並在嘉慶七年任日講起居注官，八年降為左庶子，九年升為侍講學士，十一年十一月為詹事府詹事。參見《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53，頁 127、卷 1354，頁 134、

王宗誠留在北京與梁上國上奏間的關係，但當時包括當時汪廷珍在內的中央朝臣都曾通過鄭兼才處得到《紀略》。<sup>104</sup>即是，當時位處內閣中樞的大學士文官王懿修、汪廷珍等二人，或多或少與蛤仔難相關人員有密切關係，並曾瀏覽過《紀略》與其中附圖；隨後，皇帝採納楊廷理、梁上國建議把原摺撥交閩浙總督阿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等悉心妥議。<sup>105</sup>從這樣的舉措來看，難以忽視的是朝中翰林、詹事的影響力，而張師誠也是此網絡中的一環。換句話說，當時朝中的王懿修、王宗誠、梁上國、地方大員張師誠、在臺灣的楊廷理等人，串成一個綿密的且涵蓋各層級官員的人脈網絡。

據此人脈網絡，似乎可梳理成二群體。即便楊廷理早已「認識」吳沙，在蛤仔難議題上與吳沙、淡水商紳立場一致，贊成將該處納入帝國統治，並採取吳沙等人控制、蕭竹圖所標示的路線進入蛤仔難。然而，這並非說楊廷理就與吳沙集團站在同一陣線。由於吳沙拓墾集團或是淡水商紳集團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人曾在淡水同知以外有過其他官場人脈網絡。相反地，楊廷理恩師王懿修、好友王宗誠，甚至是謝金鑾直接聯繫的梁上國，都可與以蔡新、王懿修為核心的人脈網絡相連結，或可解釋為何楊廷理在〈節略〉中有意規避地說蔡必發是「假托蔡中堂新族姪」。換言之，楊廷理得到的支持是來自府城商人，並且以王懿修為主的朝廷翰林高級文官、蔡新為中樞的臺灣產業關係所構築，與淡水商紳、吳光裔拓墾集團的人群不同。很可惜，受限於史料，我們仍無法理解來自府城的商人究竟是誰。<sup>10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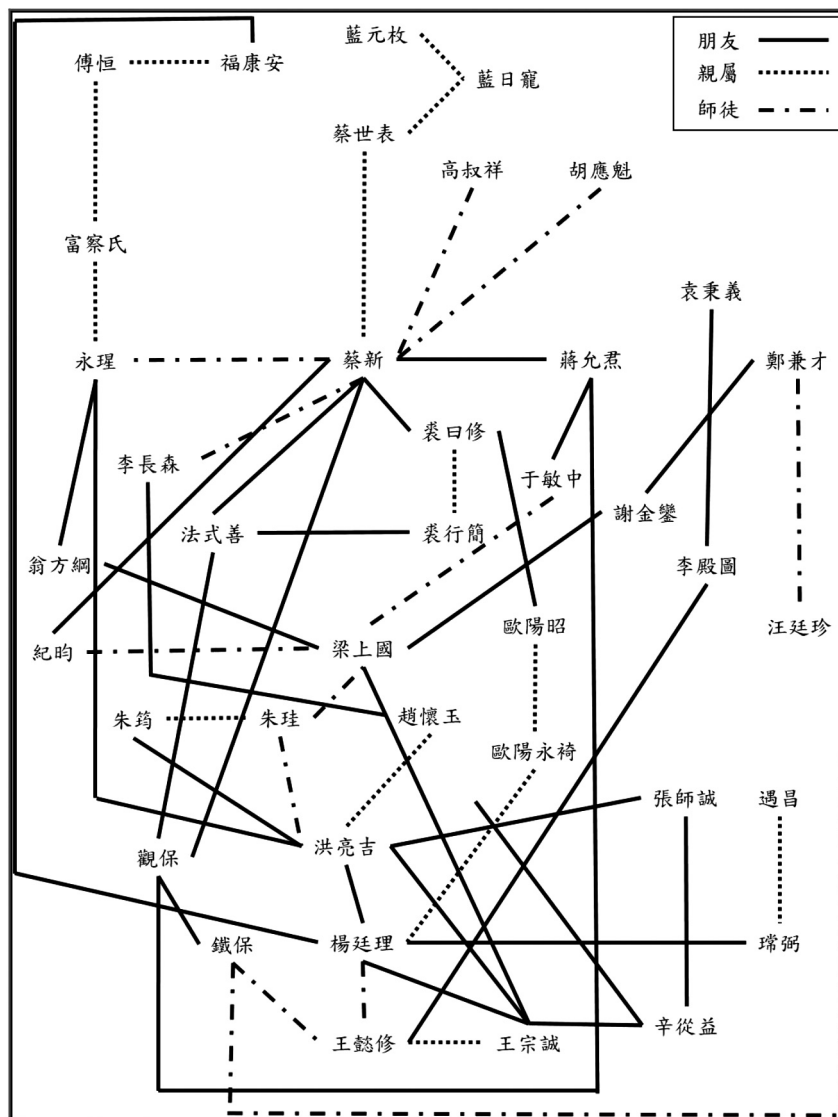
卷 1403，頁 854、卷 1480，頁 768；《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1，頁 363、卷 33，頁 375、卷 97，頁 288、卷 110，頁 462、卷 126，頁 702、卷 135，頁 841、卷 169，頁 206。

<sup>104</sup> 鄭兼才會把《紀略》給予汪廷珍過目並求取序言，也提供給辛從益瀏覽，他們均為王懿修、王宗誠之朝中同僚。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8，頁 377-378。

<sup>105</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7，頁 365-370。

<sup>106</sup> 串起的關鍵人群疑與藍家有關，藍家長期在里港、藍興、鹿港、府城、漳州、海澄等地均有產業和相關據點。且，藍元枚與楊廷理戰時為同僚，從朱一貴到林爽文事件，藍家因為參與戰爭得以在邊疆獲得產業。雖然藍氏族譜講得頗為隱晦，但此家族在朱一貴事件後從漳浦移居中港，後藍崇德之孫承顯、承略、承令（1778-1836）遷居羅東。當時該處尚未開墾，因此他們定是屬於前往界外違法拓墾者，且開墾區域還是在吳沙等集團無法企及的東勢地區。噶瑪蘭入職方後，他們獲得四圍到羅東不少土地，更成為羅東重要家族。根據一份契約，宣稱「嘉慶貳年隨吳沙入蘭和番捕賊，奉憲九月十六有應份四圍內店地貳坎」，暗示藍家與吳沙的關係，且「奉憲」獲得產業。

圖 7 蔡新、王懿修的中央、臺灣官場、社會人脈網絡



說明：筆者自繪。

參見何兆欽主編，《藍氏族譜》（臺北：何藍韓姓宗親會，1970），系 18-系 21；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rch\_cca100051-hm-od\_0052\_01-0001-i.txt；Cheng-heng Lu, “The Art of being an Imperial Broker: The Qing Conquest of Taiwan and Maritime Society (1624-1788)” (Ph. D. dissertation,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2020), pp. 204-211；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期 62 期（2019 年 12 月），頁 11-14。



嘉慶六年，在包括界內淡水商人團體、界外拓墾集團的合作下，蕭竹圖或已隨著陳請而被一同帶往臺灣府城進行遊說。不過隔年，這次活動仍在吉壽援引前任同知李明心的反對意見而失敗了。嘉慶八年，蔡必發墾號趁著蔡新學生胡應魁、與蔡新關係密切的裘行簡分別擔任淡水同知、福建布政使時陳請陞科；吳姓族人再次找上已多次拜訪過、時任福建巡撫的李殿圖。換言之，吳姓族人和淡水商紳，或是以蔡、王為首的人脈網絡有共同的目的，即便眾人利益相衝突，但均企圖從官場的人脈網絡中尋找最合適的可能性來勸說帝國進行相關的舉措，謝金鑾的《紀略》和附帶的蕭竹圖扮演著重要角色。確實，楊廷理、謝金鑾、鄭兼才都是促進整起事件發生的主要人物，但一直以來令人無法理解的問題是，為何最後開蘭後，楊廷理卻欲除去吳氏拓墾集團的勢力？

#### 四、知識重製：從〈楊太守新圖〉到〈噶瑪蘭輿圖〉

蕭竹圖在臺灣流傳甚廣，傳遞了通俗性地理空間知識。該圖也為嘉慶十二年時楊廷理入蘭處理朱潰事件所用，並在離開時繪製〈楊太守新圖〉，被《蛤仔難紀略》所收錄。本文將依據《蛤仔難紀略》中所提到的〈楊太守新圖〉進行分析，另外討論《軍機錄副》中一幅未曾被學界探究的〈噶瑪蘭輿圖〉。〈噶瑪蘭輿圖〉內容可分五種：一是路線、二是地名、三是地理標示、四是五圍城內的狀況、五則是番社。路線可分為四條「入蘭路線」與從五圍城通往羅東等地區。地圖是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重要構成，自十八世紀下半葉起，藉由帝國、商人、拓墾者繪製、調查和分類世界的知識革命已經開始進行。<sup>107</sup>

<sup>107</sup> A. G. Hopkins, "Globalization—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2), p. 6. Christian J. Koot, "The Merchant, the Map, and Empire: Augustine Herrman's Chesapeake and Interimperial Trade, 1644-73,"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4 (October 2010), pp. 603-644.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Introduction: Situating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World," in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eds.,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Lucy P. Chester, "The Mapping of Empire: French and British Cartographies of India in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Studies*, vol. 16 (2000), pp. 256-275. J. H. Elliott, *Empires of*

從此點而言，可以把蕭竹圖理解為地方人士——尤其是界外人士——畫出尙未控制的邊疆地帶，楊廷理圖在此基礎上重製，展現地方官員的認識論，與歐洲早期近代帝國運用地圖語言繪製帝國擴張、形塑管理擴張帝國的工具和方式。<sup>108</sup>據此，從蕭竹圖到〈楊太守新圖〉到最後的〈噶瑪蘭輿圖〉的傳承過程，是一份基於蕭竹圖「再製」的產品，一方面延續既有的脈絡和手法，一方面添加了更加明顯的官方元素於其中，將界外人士、地方繪製地圖轉變為地方官員進言——〈雙銜會奏〉——的工具。

圖 8 《諸羅縣志》山後圖（蛤仔難部分）<sup>109</sup>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5.

<sup>108</sup>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3, 23. 例如德川幕府從 1644 年到 1830 年代，也正經歷一場將蝦夷地從不精確的框架到以新製圖描繪的轉變，將蝦夷從模糊的界外地域變成擁有詳細港口、地點和河流境內地區。Brett L. Walker,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5.

<sup>109</sup> [清]周鍾瑄主修，[清]陳夢林總纂，《諸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首，頁 10-11。

據《蛤仔難紀略》描述《諸羅縣志》的山後圖：「固甚略矣，然而港汕之說已具，如彎環者全體已得。」<sup>110</sup>（參見圖 8）《諸羅縣志》所謂的「港汕」，指烏石港與當時仍被認為是沙洲的區域，「彎環者」是描述山脈環繞平原地帶。此圖河流將該區域切割成五塊，外海沙洲被河口切割成二處，龜山島位於二沙洲交界處外海，即是整個平原中間處。在沙洲北端及入蘭前沿海礁石亂石堆疊，構築出康熙年間對於此區域的地理認識。<sup>111</sup>

圖 9 為〈楊太守新圖〉，謝金鑾認為楊廷理之圖形體大備，東、西勢分屬清楚，並包含「民番之錯處，莊社、田園、道途、里至畢具」，方位與〈諸羅縣志圖〉同為「背西面東」。<sup>112</sup>根據該圖中記載著：「羅東地方係潘賢文佔距，現阿里史社、岸里社番皆來集此地。」<sup>113</sup>又在蘇澳大港旁寫著：「前年蔡牽擁泊此港」；根據現有資料，嘉慶十一年蔡牽確實窺伺烏石港，停泊蘇澳一事則符合《東槎紀略》所述蔡牽、朱潰屢屢停靠該地。<sup>114</sup>此書所附的〈蘇澳圖〉中，也在港灣右側寫著「嘉慶十二年王總戎泊舟于此」、左側寫著「嘉慶十二年朱潰泊舟于此」，展現當時楊廷理入蘭時的軍事佈署狀況。<sup>115</sup>因此此圖大概就是嘉慶十二年楊廷理離開蛤仔難時所繪。正如《蛤仔難紀略》中〈圖說〉描述該圖的特點，對於道里、庄社等記載甚詳，不過若依據〈形勢〉中番社、民庄數目稱西勢 23 莊、23 社、東勢 12 社，對照此圖，雖略有出入，但大致上相符：

<sup>110</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8。

<sup>111</sup> 當時曾派人前往北邊探勘，或許就曾深入蛤仔難調查。參見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 1，頁 17。

<sup>112</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67-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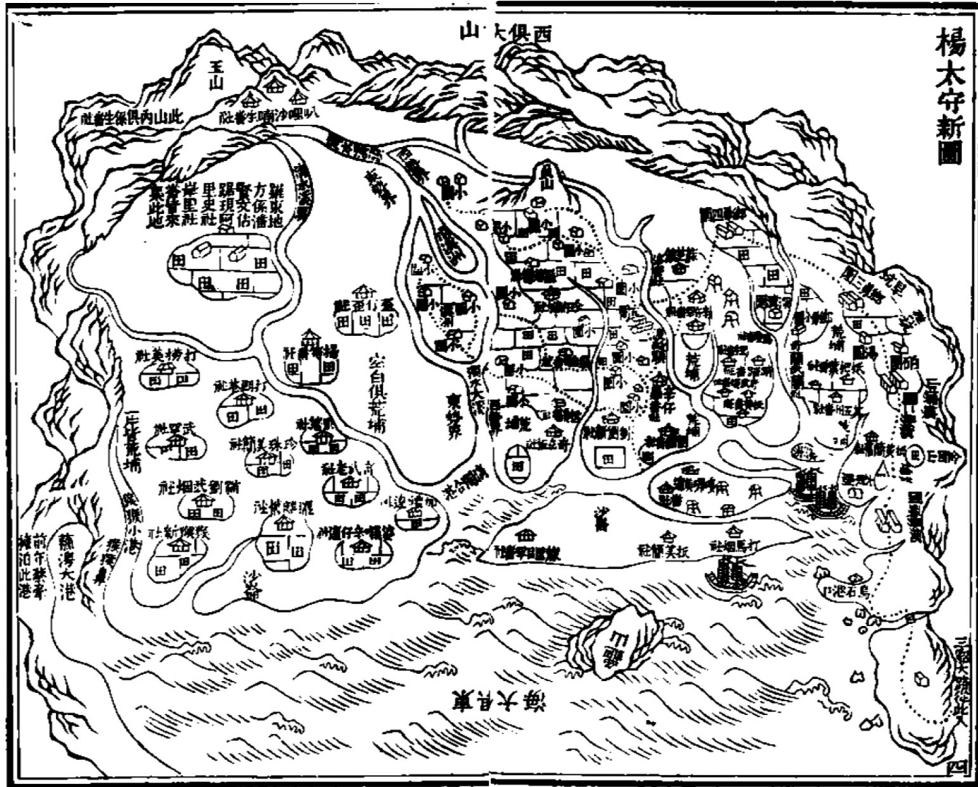
<sup>113</sup> 《東槎紀略》載：「十一年，山前漳、泉械鬥，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泉人納之，亦與漳人鬥，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合攻漳人，不勝，泉所分地盡為漳有，僅存溪洲。鬥幾一年始息。阿里史諸社乃自開羅東居之，潘賢文為之長。十四年，漳、泉又鬥，漳人林標、黃添、李觀興各領壯丁百人，吳全、李佑前導之，夜由叭哩沙喃潛出羅東後逕攻之，阿里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漳人遂有羅東；已復和泉人，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粵人乃至東勢開冬瓜山一帶。此皆十五年前事也。」參見 [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71-72。

<sup>114</sup> 《東槎紀略》載：「馬賽草山之外曰蘇澳，接界生番，東臨大海，可泊大小百艘，昔蔡牽、朱潰二逆屢泊舟於此，以窺噶瑪蘭。」參見 [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1，頁 9、卷 3，頁 73。

<sup>115</sup> 這符合嘉慶十二年的資料所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冊 12，頁 507。

西勢 23 社、26 莊；東勢實為 13 社。在各庄、圍、社旁畫有一個區塊上寫數量不等的「田」字，即是反應加留餘埔的制度，此是「楊廷理原議」。<sup>116</sup>

圖 9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版《蛤仔難紀略》之〈楊太守新圖〉



圖中也描寫了在蛤仔難境內的路線：越過壠壠嶺後，經過烏石港口、鄉勇頭圍、大眾廟、鄉勇二圍、鄉勇三圍、鄉勇四圍，之後在辛仔罕番社處分成兩條路，一條通往五圍、小圍、員山等；另一條通往渡船頭，並且在辛仔羅番社又分成二條路線，一條往劉劉番社，終於西勢大溪沿岸；另一條則一路到達下溪洲的位置而止。若將這個路線配合《蛤仔難紀略》中提到楊太守紀程，在卯

<sup>116</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41。

裏嶺腳以後沿海行即進入蛤仔難區域，一路上會經過大溪、硬枋（即梗枋）、烏石港，之後入山至頭圍、二圍、三圍、四圍、五圍，在此特別提到五圍地名三結仔，而三結仔的下一站分別為民壯圍、大四鬮。然而，這些地點並未描繪於圖中。過大四鬮到達的溪州，其上有四個小圍，屬於東勢範圍。這一段的描述卻又符合〈楊太守新圖〉的內容。過溪洲後，越溪可分別到羅東、打哪美社、珍珠里簡社、奇武荖社、新猴猴社以及最終站蘇澳。<sup>117</sup>另外，在中國國圖本提到：「東面大海中有龜嶼，略與三圍對。」<sup>118</sup>若說這個描寫是根據書中的「附圖」——無論是〈楊太守新圖〉或〈蕭松友圖〉，明顯都與二圖不同。目前唯一可以看到與三圍相對的圖，反而是〈海道圖說〉和〈北基近傍圖〉。若將前文聚焦的路線放在此圖進行思考，會發現〈楊太守新圖〉中標示了「三貂大路從此入」之處，有一個明顯的繞越山嶺而非沿著沿海進入的樣貌；根據前文所述，楊廷理進入蛤仔難是通過卯澳、壠壠嶺而入，但是此處卻標示了穿越三貂的大路，這其中究竟暗藏何種意義？筆者認為應該與〈噶瑪蘭輿圖〉一齊觀察方能理解。

由於可以肯定〈楊太守新圖〉為楊廷理在離開蛤仔難後所繪，不過楊廷理寫有〈重定噶瑪蘭全圖〉一詩：「尺幅圖成噶瑪蘭，旁觀慎勿薄彈丸。一關橫鎖炊烟壯，兩港平舖海若寬。金面翠開雲吐納，玉山白映雪迷漫。籌邊久已承天語，賈傅頻煩策治安。三農力穡趁春晴，雨霽烟消極望平。形擬半規深且邃，溪飄雙帶濁兼清。培元化布思良吏，劃界分疆順兆民。他日濃陰懷舊澤，聽人談說九芎城。」<sup>119</sup>此詩名為「重定」，意指在舊圖上重新繪製；楊廷理在該詩有關金面的詩句中自註「金面山在北，玉山在西南」，符合〈楊太守新圖〉中的方位，亦吻合〈噶瑪蘭輿圖〉之內容。不過，此詩卻又有不符〈楊太守新圖〉，然而與〈噶瑪蘭輿圖〉符合的內容：比如九芎木環城植之，但實際上〈楊太守新圖〉根本沒有任何「城」；又，所謂的「一關橫鎖」應該指控制烏石港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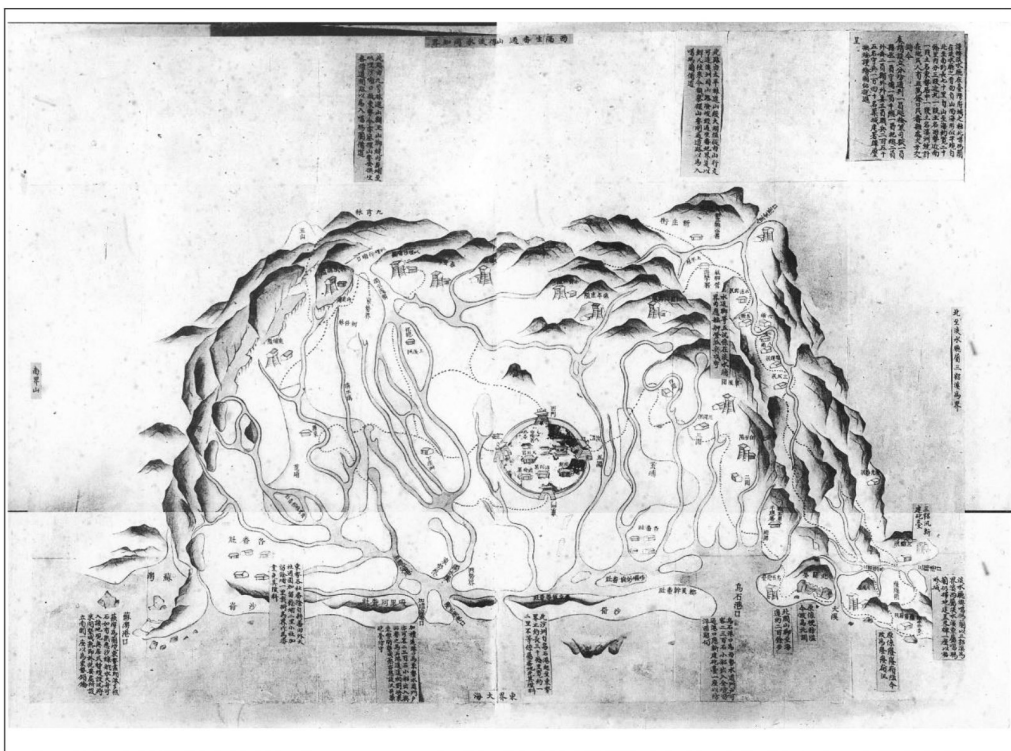
<sup>117</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頁166-167。

<sup>118</sup>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頁10。

<sup>119</sup> [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卷8，頁20。

的北關並未在〈楊太守新圖〉上被標示；而「兩港平舖海若寬」，與《蛤仔難紀略》中〈形勢〉篇與〈楊太守新圖〉所述三港均有所不同。因此，〈重定噶瑪蘭全圖〉所述的很可能並非〈楊太守新圖〉，而是〈噶瑪蘭輿圖〉（圖 10）。

圖 10 《軍機錄副》中的〈噶瑪蘭輿圖〉



〈噶瑪蘭輿圖〉分爲二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爲圖上的黏貼標籤，第二部分則是底圖。黏貼標籤的內容與嘉慶十六年汪志伊上呈的〈雙銜會奏稿〉類似，所以此圖該是當時隨〈雙銜會奏〉上呈之圖。<sup>120</sup>雖然直觀上會認爲此圖爲汪志

<sup>12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目錄上記錄此檔爲嘉慶十六年方維甸所呈，但此圖並未有任何時間具奏人之細節。由於嘉慶十六年九月汪志伊的〈勘查開蘭事宜狀〉中亦有附圖，但是其中的標示並不符合。不過無論是方維甸或汪志伊，二圖的共同始源均是楊廷理，根據對楊廷理〈重定噶瑪蘭全圖〉一詩的解讀，本文認爲〈噶瑪蘭輿圖〉即是他重繪的。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7，頁 333-335。

伊等人所繪。然而，若此圖是汪志伊等人所繪，那圖文與細節須完全符合；但二者卻有不少差異。<sup>121</sup>其一，圖與奏摺在地名有差異，例如圖中稱三爪汛處，在〈雙銜會奏〉稱為三瓜仔；〈雙銜會奏〉提到蛤仔難原有 11 處隘寮，後裁 2 處、增設 3 處。但地圖上乾溪隘寫作「旱溪隘」，鎮平隘寫作「鎮平庄隘」，也未畫出埤頂溪州隘。其二，〈雙銜會奏〉稱在五圍到羅東之間，距離 20 里的溪洲應派把總一員駐紮；對應到地圖上，位於二者之間應該是下溪洲，但地圖中「把總」位置卻在遠離該路線的上溪洲。其三，圖中並未畫出「烏石港沙汕」，也未提到其外的大洋。其四，〈雙銜會奏〉稱「栽竹為城」，強調「若必責令建築土城，工料浩繁，急切難於畢事」；然而，地圖卻是磚造城牆。若奏摺和地圖同時產生，理當用臺灣地圖中常見的竹林呈現城牆即可。其五，地圖上畫出兩塊「荒埔」，在〈雙銜會奏〉中稱這兩塊荒埔「自嘉慶十五年四月為始」，要求二年內開墾完畢，否則入官；換言之，當荒埔依舊被匡列在地圖上，意味著此圖至少繪於嘉慶十五年（1810）前的規劃。其六，在〈雙銜會奏〉中「安設鋪司」一條中，提到「據該鎮、道、府議請於艋舺至三貂，共設七鋪。」此項建議屬於嘉慶十六年討論之結果，而非楊廷理在十三年建言，所以圖中並未呈現此一規劃。綜上所述，此圖中「貼籤」展現的是嘉慶十六年汪志伊等人商議的結果，但地圖本身卻呈現另外一種狀況。考量到汪志伊此奏是援引楊廷理勘查「未墾荒埔，查明地界」、籍貫番社分配、官職汛塘設立並建言章程——也正符合地圖中所展示的幾項特點。汪志伊在到任後發現其規劃「尚多粗略之處」，因此命楊廷理等再次勘查、眾官商議後避免「僅憑紙上空談」，最終列出二十項章程。考量此奏摺製成的脈絡，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此圖大概為嘉慶十三年後楊廷理重繪的地圖，當時已經準備隨其制定章程一併上呈。

<sup>121</sup> 楊廷理此前曾制定十八則章程，而汪氏〈雙銜會奏〉中有時會特別提到楊廷理原議，例如編查保甲一項稱：「該府楊廷理前經在地選舉各姓族正，詳請責成約束」等語，後又稱「臣等覆加查核」；建造衙署一項中也稱，楊廷理曾經稟報開徵田畝、田園陞科處、加留餘埔等。但除了上述四點經過楊廷理建議、官員會商被點出讚許或修正外，其餘沒有特別提出再議，應該都已採納楊廷理舊有規劃。參見〔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36-139、141、147-148。

表 3 〈噶瑪蘭輿圖〉中圖案標示說明

路線				地名	地理標示	五圍城	番社
卯澳線	草嶺線	泉州線	粵籍線	燦光寮汛	八里坌港口	北門	都美幹番社
新庄街 【新莊縣丞署】		艋舺營 【遊擊署】	九芎林	旱溪圍	三貂港口	南門	哆囉妙婉番社
艋舺營 【遊擊署】		大坪林	玉山	鎮平庄隘	烏石港口	西門	奇立坂等番社
水返腳汛		四圍山腳隘	內鹿埔	大湖隘	濁水溪頭	東門	嘎里阿番社
五堵			叭哩沙喃口	泰安隘	清水溝	城隍廟	幾穆撈番社
六堵				叭哩沙喃隘	濁水溪	外委守備署	荒埔
七堵				柯仔林	加禮遠港	天后宮	荒埔
八堵				清水溝隘	加禮遠港口	通判署	沙崙
暖暖汛				上溪洲 【把總】	濁水溪港口	巡檢署	沙崙
三爪汛				下溪洲	蘇澳港口		
三貂汛	大溪隘			鹿埔隘	三貂溪分界		
蔴蔴嶺				蘇澳			
蔴蔴嶺汛 【額外外委】				小員山隘			
大溪				白石隘			
北關 【外委】				龜山			
烏石砲臺				員山			
頭圍 【縣丞署、千總署】							
二圍							
三圍 【三圍汛】							
四圍							
五圍							

此圖是楊廷理以納入蛤仔難之官方規劃所繪製，因此明顯展現了官方觀點。然而，卻展現了與蕭竹圖極為類似的構圖，均以一據點為中心，山脈環繞，中間雖不似蕭竹圖用堪輿意義上的同心圓結構，但以某一主要城鎮為中心被環狀河流將各處切割成塊狀的樣貌頗有雷同，甚至蘇澳畫法、沙丘帶與陸地間獨立的「島嶼」數量、玉山以白色畫法都與蕭竹圖更為類似，與謝金鑾曾提及的《諸羅縣志》圖有所差異。再者，此圖展現了與蕭竹地圖類似，利用路線將界



內、外合併的觀點。〈噶瑪蘭輿圖〉的起點為縣丞所在的新庄街，並標示官方據點，整幅圖的中心為城池環繞的五圍，內標示有衙署：外委守備署、天后宮、通判署、巡檢署、城隍廟、山川、社稷壇等。<sup>122</sup>對照蕭竹圖，可以發現二者出發點一是艋舺、一是新莊，前者雖然有軍隊駐紮，但後者是縣丞所在的行政中心，加上沿途強調的官方據點，可見該圖已經完成由民間地圖到官方地圖的轉向。將起點延伸到新莊，而非僅是吳沙拓墾集團背後的淡水艋舺商紳集團，並且試圖抹去吳沙的痕跡，例如從三爪汎後的地名均未做標示，丹裡莊更是完全消失，唯有保留下路線。

〈噶瑪蘭輿圖〉既是楊廷理在原有地圖基礎（可能是嘉慶十一年〈楊太守新圖〉）上重繪，因為目的和時空背景不同，二者在細節與側重有些許差異，但是形制上頗為相似。不過，〈噶瑪蘭輿圖〉與〈楊太守新圖〉間最大的差異即是：在一幅地區性地圖（如蛤仔難和界外）中，卻包含了其他地區（如淡水廳和界內），並且標示跨越行政界線引領進入蛤仔難的路線，這一點正是延續了本文所討論三幅蕭竹圖利用路線串連界內、外之特點。尤其，此圖和蕭竹圖間最直接的知識承繼則是路線描繪，也是闡述官方觀點的敲門磚之一。此圖既畫出蕭竹圖從壠嶺繞過卯澳的路線，也繪出規劃中的從九芎林經玉山通往叭哩沙喃口粵籍、大平林抵達溪洲的泉籍入蘭備道；更重要的是，畫出一條越過草嶺直達大里簡的路線——即是日後的草嶺道。這正是〈楊太守新圖〉中所標示的路線。由於入蘭路線具有明顯的時間性，展示不同時期的地理空間知識。例如十七世紀以前，漢人、原住民已通過海路進入蛤仔難。<sup>123</sup>朱一貴事件後，藍鼎元、陳倫炯等都曾調查繪製過蛤仔難地圖，<sup>124</sup>雍正十二年（1734）到乾隆

<sup>122</sup> 這些描述符合〈雙銜會奏稿〉中描述建造壇廟與衙署的名稱。參見〔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35-137。

<sup>123</sup> 例如 1657 年，Jacob Balbiaen 等人從雞籠循海路到三貂候風後，繞過三貂角進入噶瑪蘭地區拜訪了重要的貿易番社哆囉美遠。參見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vol. 4, pp. 277-296.

<sup>124</sup> 〔清〕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 2，頁 24-26。現知的蛤仔難或臺灣後山地圖，還有雍正八年（1730）年陳倫炯所繪製的臺灣後山地圖，參見「清代東

二十四年（1759）製成的〈臺灣府汛塘圖〉中，僅標註「淡水山後蛤仔爛所屬二十七社於雍正二年（1724）歸化」，未畫路徑。<sup>125</sup>乾隆四十年（1775）到五十一年完成的〈臺灣汛塘望寮圖〉雖標示一條終點在錫口的路線，但並未展現通往「界外」蛤仔難之路線。<sup>126</sup>據信始繪於嘉慶九年（1804）的〈19 世紀臺灣輿圖〉，不僅是另一份蕭竹圖所透露展現之路線知識的承繼者，與〈楊太守新圖〉內容相當類似，或許二者有地理知識上的承續關係。<sup>127</sup>尤其〈19 世紀臺灣輿圖〉上紅虛線所標示者，也是通過具指標性的「籠籠嶺」（該圖寫籠籠嶺），經「卯里澳」，抵達「頭城」。<sup>128</sup>雖然整體的繪製形制與蕭竹圖不同，更接近〈諸羅縣志圖〉的河流平行區隔繪法，但路線上仍接續了本文所探討三幅圖上的路線。〈19 世紀臺灣輿圖〉的內路起點均為「艋甲街」；其中從丹裡（該圖寫丹里）往後抵達五城幾乎完全相同：「丹里、三貂嶺、三貂社、籠籠嶺、卯里奧、大眾廟、頭城、二城、三城、湯圍、四城、五城三結街。」由於該圖是一幅全臺地圖，但當中可見諸羅圖、蕭竹圖、〈楊太守新圖〉的各種特點，即意味著嘉慶年間界外的路線知識，從原先界外人士、地方官員擁有的地方性地圖已被嫁接到全臺性的輿圖上。

〈噶瑪蘭輿圖〉不僅列出既有的路線，所標示的新路線暗示官方納入此區域後將嘗試擺脫拓墾集團對路線之壟斷，楊廷理即使入蘭採取吳沙等人釋出之壠壠嶺線，至少根據〈楊太守新圖〉已經可以發現他將三貂草嶺線標示出來，換句話說，他已經某種程度上通過地圖暗示欲擺脫吳沙控制交通的企圖；即便

---

部後山圖」，<https://thcts.sinica.edu.tw/themes/rc18-4.php>（2021 年 12 月 8 日檢索）。盧雪燕、劉欣欣、許智瑋、黃景彤，〈《臺澎圖》、《沿海岸長圖》為黃叔瓚所繪考：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故宮學術季刊》，卷 31 期 3（2014 年春），頁 155-198。

<sup>125</sup> 參見「臺灣府汛塘圖」，[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3](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3)（2021 年 8 月 14 日檢索）。

<sup>126</sup> 參見「臺灣汛塘望寮圖」，<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124>（2021 年 8 月 14 日檢索）。

<sup>127</sup> 〈19 世紀臺灣輿圖〉中同樣標示潘賢文在東勢，〈楊太守新圖〉在頂、下溪洲旁註明「空白俱荒埔」，但〈19 世紀臺灣輿圖〉則寫著「此片係荒埔，今作民壯小園」。二圖在蛤仔難區域的虛線路徑類似，但是前者明顯已經將路徑畫至東勢區域。

<sup>128</sup>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 世紀臺灣輿圖〉，<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18.011.0001>（2021 年 10 月 6 日檢索）。

此新路線直到道光年間才取代原先越過壠壠嶺、卯澳的路線。姚瑩於道光元年（1821）所寫的〈臺北道里記〉提到：「楊廷理新開路東，因其路迂遠，人不肯行，故多由此舊路。」<sup>129</sup>姚瑩所採取的草嶺道路線通過三貂社後，往南穿山而過，過下雙溪、遠望坑、草嶺抵達大里簡；而楊廷理入蘭時則避開草嶺持續往東前往卯裡、往南越過壠壠抵達大里簡。<sup>130</sup>

《噶瑪蘭廳志》對入蘭孔道有如下紀錄：「蘭入山孔道，初由東北行，自淡水之八堵折入雞籠，循海過深澳至三貂、隆嶺，入蘭界。」此後蛤仔難開疆前，改成：「嗣改從東行，由暖暖、三瓜仔過三貂，則比諸由雞籠而稍近矣。」開疆後再改爲：「三瓜仔迤東南行，三貂、魚桁仔、遠望坑過嶺，至大里簡，入頭圍。此即今所行，視舊路又較近矣。」<sup>131</sup>因此，第一條路線即是蕭竹圖所述的外路。姚瑩在進入蛤仔難就已認識到楊廷理在過三貂嶺後，「開關」的東部新道——即走卯裡、壠壠——過於遙遠，因此多數人仍是偏好三貂社後越過草嶺等地直達大里簡、頭圍。<sup>132</sup>（參見圖 11）蕭竹和楊廷理的圖都是現地觀察後、具有目的性之展示，與帝國所需不同。即是界外人士（蕭竹）、邊疆官員（楊廷理）所畫的地方性地圖某些知識被帝國所吸收，但被整編入帝國所認識的地理空間知識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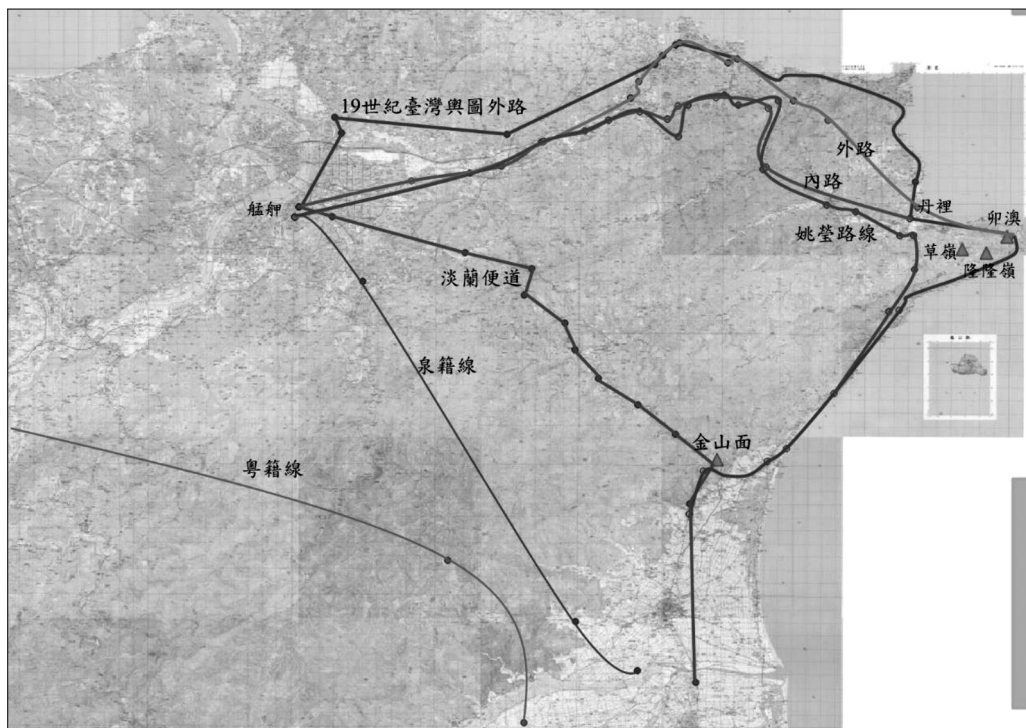
<sup>129</sup>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15，頁 397。

<sup>130</sup> 即使蕭竹圖所繪的路線在此後較少被利用，但此知識仍然被記錄下，例如《噶瑪蘭廳輿圖纂要》中，特別把卯澳（柳鼻山）標示出來，並在隆嶺處標示「舊路從此入蘭，六日始達」的字樣。作者不詳，《噶瑪蘭廳輿圖纂要》，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本，引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https://stfb.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713344424584>（2021 年 10 月 6 日檢索）。

<sup>131</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8，頁 432。

<sup>132</sup> [清]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91。

圖 11 各種入蘭路線之現代地圖標示



說明：筆者自繪。

當楊廷理在嘉慶十三年返回府城後，嘉慶皇帝令賽沖阿再次調查納入蛤仔難的可能性。嘉慶十三年四月，即便理論上從未涉足蛤仔難，且其奏摺引述楊廷理所言，但賽沖阿實際上是請署任臺灣知府的鄒翰議覆。該奏摺中的地理知識，因而與〈番社分布圖〉較為符合。賽沖阿這份奏摺中指出，「蛤仔爛，北有烏石港，南有蘇澳，為海口門戶」，而非楊廷理圖所言的「三港」；又提到溪北西勢處，「有土圍五所」——符合蕭竹圖的五處土圍，而非楊廷理圖的狀況。關於三十六社番社，則提到打馬烟在內有十社依水傍山，奇蘭武蘭等二十

六社則是民屯錯處。又提到「東勢生番十三社」，上述二點與〈番社分布圖〉中的番社描述相同。<sup>133</sup>此外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梁上國稱：

蛤仔難地勢平曠，北西南三面皆山，惟東面臨海，海口有洲嶼蔽之。  
其北隅有港曰烏石港，南隅有港曰蘇魯港。兩港之船可自為出入，不  
必與臺郡相聞。……，其水有三溪分流，中大溪為南北之界。其北境  
由烏石港入者自北而南，有頭圍、二圍、三圍、四圍、五圍，近年又  
增六圍。<sup>134</sup>

梁上國文中所闡述不少資訊都無法在蕭竹或楊廷理圖中找到，例如六圍等。然而，文字中部分描述與蕭竹圖更加符合，例如「兩港」與楊廷理的「三港」不同；三溪的描述是蕭竹圖的特點而非水道縱橫的楊廷理圖所展示的。即便如此，賽沖阿嘉慶十二年的另一篇奏摺卻又來自楊廷理稟稱，其知識與楊廷理圖較為類似；<sup>135</sup>方維甸在十五年（1810）上奏的內涵也與楊廷理之圖重疊——也可證明〈噶瑪蘭輿圖〉繪於十五年前。<sup>136</sup>因此，官員在探討處置蛤仔難的過程中，地圖扮演著對於遙遠邊疆的認識和理解的普遍方式。

此外，過往研究已經證明地圖中展現出風水堪輿對於帝國合法性和理想性的影響。<sup>137</sup>林開世曾指出：「它（風水）不該被視為一種與國家正統對抗的另

<sup>133</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頁367；《明清史料·戊編》，第6本，頁548-549。

<sup>134</sup> [清]孟昭涵修，[清]李駒等纂，《長樂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23，頁45。

<sup>135</sup> 例如賽沖阿在嘉慶十二年九月奏摺提到：「奴才……並據該府楊廷理稟稱：行抵三貂地方，有蘇澳蛤仔爛民番出山迎迓。……九月初七日自雞籠澳開行，初八日未刻抵蘇澳，望見澳口窄狹，兼有險礁，匪船拋泊澳內不動，恐有詭計。……惟澳口礁石縱橫，兵船難以停泊，現在寄碇澳外。」參見《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冊116，頁136-138。

<sup>136</sup> 又方維甸在嘉慶十五年的奏摺稱：「隨查淡水玉山之後……，地名噶瑪蘭，係番語。閩音不正，訛為蛤仔難。其地三面距山，東臨大海，平原寬廣，形若半規。南有蘇澳，可進大船；北有烏石港，僅容小艇。中有濁水大溪，出山東注，原在噶里阿完社東旁入海；近年故道淤淺，正溜北徙，繞過員山，逕五圍之東，由烏石港入海。……民人所居，自五圍之外，尚有員山、溪洲、羅東、湯圍、柴圍、大湖圍、三十九結圍、都美鶴圍、勞勞圍、下溪洲、幾穆撈、辛那罕等處及圍外零戶。」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頁332。

<sup>137</sup> 洪健榮、石文誠均通過地圖中風水觀之實踐進行研究，參見石文誠，〈古地圖的美學、風水觀與實用性：清代方志中臺灣府城地圖的探討〉，《白沙歷史地理學報》，期16（2015年9月），頁47-68；洪健榮，〈塑造境域「佳城」：清代臺灣設治築城的風水考量〉，《臺北文獻》，期155（2006年3月），頁45-114。

類傳統，而是一種開放性的技術，針對在既有的社會力量及宗教性的超自然力量之外，還存在的另一種自然力量（真實或想像的）進行推算與操作，為特定的主體謀求利益。」<sup>138</sup>類似的狀況，如淡水同知朱潮在嘉慶十五年建署時，委由南安人、同樣熟悉堪輿的梁章讀處理。梁章讀在閱讀完一份「地圖」後，對於設署方位提出了一份見解，指出蛤仔難：

其西南諸峯，環繞朝護；北起雞籠尖峯，從遙暗拱；東面海岸復有沙堤百里為關攔。且海水汪洋中特起龜山，蔚然青秀，居於寅位。龍氣從乾轉辛而發，落脈平陽，突起員山，居於申方；從庚而轉，拓開平原數十里，真大有為之地也。其水源，支分兩派，從坤申方來：一由艮方出烏石港，一由乙方出濁水溪。<sup>139</sup>

對照上述的描述，可以發現該分析乃基於〈海道圖說〉或〈北基近傍圖〉，而非〈蕭松友圖〉等，因為唯有二圖中的龜山島位於卯位。換言之，即便設廳治，流傳甚廣的蕭竹圖仍是仰賴的重要基礎，而非從官方角度繪製的楊廷理之圖。

因此，汪志伊於嘉慶十六年上奏的〈雙銜會奏稿〉，很可能是一份配合楊廷理於嘉慶十二年處理朱瀆事件後繪製地圖的奏摺。〈楊太守圖〉無論是形制或是地名標示、路線等，都可以清楚看到蕭竹圖的痕跡，與《諸羅縣志》圖僅有方位的類似，內容和形制則完全不同。運用蕭竹圖中連接界內外的概念，並補上官方視野，例如起點改由新莊而非艋舺，路線改變避開丹裡等，都在在顯示楊廷理將之重製為地方官員視角的版本，嘗試抹去界外人士的影響力和痕跡。雖然楊廷理採取吳沙集團所揭示的路線入蘭，並且訴諸圖文，只是同時畫出另一條既存路線，姚瑩甚至誤會該路為楊廷理所新開闢。道光朝以降，板橋林家主導修繕通往噶瑪蘭的道路，姚瑩等人進入噶瑪蘭的路線也已經從原先的正路變更到另一條草嶺路線——該路在〈楊太守新圖〉和〈噶瑪蘭輿圖〉中均由楊廷理所標示。這一段故事，似可回應有關嘉慶朝地方、官方知識建構傳承

<sup>138</sup> 林開世，〈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一個人類學的反思〉，《臺灣人類學刊》，卷 5 期 2（2007 年 12 月），頁 90。

<sup>139</sup> 參見〔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2，頁 22。

的變化，與王文生（Wensheng Wang）在討論國家轉向「地方菁英能動主義」（elite-activism）相呼應，就可指出蔡牽與清帝國間的戰爭是嘉慶朝控制海域的展現，似乎可進一步與蕭竹圖一步步轉變、知識傳遞成爲〈噶瑪蘭輿圖〉的過程進行參照。<sup>140</sup>

## 五、結 論

嘉慶十五年四月初四日，楊廷理發出章程十八則、並提供丈繩器具，象徵即將丈量田土，將噶瑪蘭納入帝國統治，他已「胸有成竹，了無難色」。十七年二月，噶瑪蘭廳正式設立。<sup>141</sup>同年，楊廷理六十六歲生日時，寫下「荒陬拓土見平田」詩句，並在句後記道：「噶瑪蘭善後事將竣」，並且表示：「喜從圍聚得真樂，鴻指春深百卉鮮。」<sup>142</sup>這一位在設廳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官員或許因此獲得絕佳的生日禮物。

本文分析的三幅地圖之源圖，當是出自吳沙拓墾集團邀請的堪輿師蕭竹之手。其主要目的在於描繪、指引如何從「帝國」疆域內步入「界外」。此企圖值得重視者有二：其一，繪圖者背後集團即是此間最大的利益關係人，但在界外的活動卻是非法的，他們所期待的是利用地圖把他們的界外非法變成疆域內合法身分。其二，替「帝國重新編寫邊界」一事，從帝國手中落入了在邊界活動的「殖民者」身上，不僅能夠與同時期歐洲帝國相互比較，也落實了乾嘉變革中，有關地方能動性取代帝國任務的地方轉向之說法。因此，嘉慶二到七年以前，這些「界外之人」積極努力勸說將此處納入帝國疆域，呼應著嘉慶二年後一種從地方發起的「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這種反向的推動，可與韓承賢（Han Seunghyun）如下主張相印證：「乾嘉變革」中，嘉慶朝經歷

<sup>140</sup> Wensheng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00-203.

<sup>141</sup>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 13，頁 178；姚瑩，《東槎紀略》，卷 3，頁 76。

<sup>142</sup>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8，頁 399。

了一場將帝國責任下放給地方仕紳的地方能動主義與轉向<sup>143</sup>然而，地方人士對於壟斷控制該處的期許並沒有完全達成，反而是中央、地方官員通過楊廷理和蕭竹地圖，以之為基礎，建構一系列對於界外的知識，促成了納入蛤仔難的目的。蕭竹和楊廷理的地圖和衍伸之各種版本成為官員們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甚至被姚瑩誤會通往卯澳的路線為其所開，實際上，楊廷理不過只是遵循著吳沙拓墾集團開闢控制的路徑罷了。

探討十八世紀後帝國區域知識，往往強調歐洲帝國製圖技術重塑疆界並對領土權的宣稱。<sup>144</sup>過往的研究指出清帝國末系統與制度性地收集海外世界的知識，僅通過接觸、口說，最後訴諸於文本，形成對海洋世界之認識。<sup>145</sup>近年來，布琮任（Ronald C. Po）、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等提出相左意見，考察清代知識分子與海外接觸後留下的文本，探討他們如何把自身所處的國度納入更宏觀的海洋世界；乾隆時期的地圖編製已有建構世界性觀點的本質性改變，但 1819 年後，地圖又再次回到由中國中心的排他主義思想所主導。<sup>146</sup>因此，本文所分析的四幅地圖，可視為帝國對海疆的進一步認識、理解。

---

<sup>143</sup> 在韓承賢的研究中，主要強調菁英能動主義大發生於十九世紀以來嘉慶朝作為地方出版事業在經濟與管理上，由地方人士扮演的重要腳色已經取代十八世紀由國家所主導的情形；參見 Han Seunghyu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pp. 15-17.

<sup>144</sup> Nour Nicole Dados, "Mapping Empir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in Alena Strohmaier and Angela Krewani, eds., *Media and Mapping Practic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ducing Spac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7-44; Laura Hostetler, "Global or Local?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26 (2007), pp. 117-135.

<sup>145</sup> Ng Chin-Keong, *Boundaries and Beyond: China's Maritime Southeast in Late Imperial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17), pp. 191-204.

<sup>146</sup> 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帝國與邊緣：1644 年至 19 世紀清朝與日本及琉球關係比較研究〉，收入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輯 2，頁 226-245；Ronald C. Po, "Writing the Waves: Chinese Maritime Writings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2 (October 2015), pp. 343-362.



過往關於風水的研究對「地圖」著墨較少，因此蕭竹圖或也該被置於此脈絡下思考。<sup>147</sup>風水作為普遍信仰行為法則，展現揀選地點價值觀與人地關係，蕭竹既是風水堪輿者，繪製時亦將「背山面水」、「懷抱有情」等對理想世外桃源的風水文化情懷注入。<sup>148</sup>林開世主張風水並非一種宇宙觀，而是一種社會權力與心理層面效果的作用，相較於關注其文本效益，更應該理解其實際空間上的運用。<sup>149</sup>本文則認為可與林開世的觀點互作參照，通過堪輿師蕭竹實作出來的地圖，亦可理解文本與實作交雜呈現的產物。

林開世談論《噶瑪蘭廳志》作為方志形成的原因，闡述知識如何扮演一個開放性系統上的構造，從中理解該《廳志》在整個帝國理解邊疆書寫的地位。同時也強調風水秩序構築的山川結構，是該《廳志》的一大特色，也闡述了一種地方性的空間知識與秩序。<sup>150</sup>過往，鄧津華廣義地主張清帝國於 1683 年將「海外」（beyond the seas）臺灣領土併入疆界，是帝國擴張並將既有中國概念轉變為超越傳統帝國空間，重新定義邊界構築新的「中國」形象。<sup>151</sup>既然納入廣義「臺灣」重新定義了「中國」，那將蛤仔難納入帝國疆域，同樣可被視為新一步拓展，可與過去歐洲早期近代帝國在殖民拓展過程相互映證。

<sup>147</sup> 可參見蔡增仲、林仁川，〈清代臺灣城市規劃的變體禮制思想〉，《中華建築技術學刊》，卷 7 期 1（2010 年 6 月），頁 57-76。

<sup>148</sup> 李姍姍，〈從《輞川圖》談起——淺論中國山水畫中的堪輿意識〉，《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5 期，頁 135-137；洪健榮，〈近百年來海內外學界關於臺灣「風水」文化研究的歷史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期 38（2019 年 6 月），頁 1-48。

<sup>149</sup> 林開世，〈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一個人類學的反思〉，頁 63-122。

<sup>150</sup> 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卷 18 期 2（2007 年 6 月），頁 1-60。

<sup>151</sup>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pp. 3-5.

附表 1 〈雙銜會奏〉與〈噶瑪蘭輿圖〉文字部分比較

編號	標籤內容	〈雙銜會奏〉
1	謹按：淡水廳在臺灣府城之極北，噶瑪蘭在淡水廳之背面，負山面海，形似半規。自北至南約長七十里，自山至海約寬二十餘里，內分三段，近北一段土名西勢，近南一段土名東勢，居中一段土名溪州。統計在地民人有五萬餘口，民番雜處，犬牙交錯。今奏請設立分防通判一員、巡檢兼司獄一員、縣丞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三員、戰兵二百五十五名，守兵一百四十名。築城建署，彈壓撫綏。謹繪圖貼說進呈。	查噶瑪蘭與艋舺相近。據該鎮、道、府議請該處設立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三員、戰兵二百五十五名、守兵一百四十名，總歸艋舺營遊擊兼轄守備同通判駐劄五圍，存城把總一員、協防外委一員、額外外委二員、兵丁二百一十五名。
2	水返腳等五汛係在淡水廳界內，應艋舺營派兵戍守。	至於三貂港口應設砲臺汛守及沿途之燦光寮、三瓜仔、暖暖等處應添設汛防，俾與噶瑪蘭聲勢聯絡，係在淡水廳界內，應由艋舺營派弁帶兵輪防等情。
3	三貂汛新建砲臺。	
4	淡水廳與噶瑪蘭以三貂溪為界，溪西屬淡水，溪東屬噶瑪蘭，仍擇地建蓋界碑一座，以昭畛域。	劃分地界，以專責成也。查淡防廳屬輿圖，北自七堵、八堵至三貂嶺番社為止。其由三貂社過溪，迤北轉東，即蔭蔭嶺，向為界外。今噶瑪蘭既議設立分防廳營，必須劃定分管地界，以專責成。應請如該鎮、道、府所議，以三貂溪為界，溪西為淡水同知界管，溪東為噶瑪蘭通判界管。一切命盜及上批自理詞訟錢糧倉穀等項，各照所轄地方勘查詳辦，俾事有專責。仍令於分界處所，豎立界牌，用昭畛域。
5	原係蔭蔭嶺隘，今改為蔭蔭嶺汛。	蔭蔭嶺脚應設一汛。
6	原係梗枋隘，今改為北關。	其將近頭圍五里之外地名硬林，高山險峻，由山脚至海邊約二百步，大石鱗列，天生門戶，為噶瑪蘭全境咽喉要道；應就地建蓋北關一座，派外委一員，帶兵三十名駐劄防守，專司啟閉，盤詰奸宄，毋許溷跡潛入。
7	北關山脚至海邊約二百餘步。	
8	烏石港口為西勢水道門戶，可容二三百石小船出入，全境皆通港口，應新建砲臺一座以防洋匪窺伺。	該地烏石港洋面，常有匪船游奕，誠恐竄入滋擾，請於港口建築砲臺一座，撥兵架砲防守。……。又烏石港口應建砲臺一座，砲臺之旁應建兵房三棚，以資防守兵丁棲止。
9	此沙洲自烏石港起至東勢界止約長三十餘哩，寬約一二里不等，係屬番地，免其陞科。	其西勢、哆囉美遠等二社，群處沿海一帶沙洲之上。查西勢荒埔，久為民人開墾，不能再留餘埔。應將現在餘埔，自烏石港口至東勢界止，約長三十餘里，寬一、二里不等，永為西勢番業，不許民人過溪越墾。

10	<p>加禮遠港口為東勢水道門戶，亦可容二三百石小船出入，與西勢之烏石港遙遙相對，將來東勢開墾成熟，亦應設汛並築砲臺防守。</p>	<p>其由五圍至溪洲，計程十二里；溪洲應派把總一員，帶兵四十名駐劄巡防。其溪洲至羅東，計程二十里；該處貼近加禮遠港口，亦應派弁帶兵駐劄，但羅東荒埔多未開墾，現無民居，其加禮遠港亦無小船出入，似應暫緩設汛，俟二、三年後開墾成熟，在地有人，再行派弁帶兵彈壓。仍於加禮遠港口建築砲臺一座，派兵架砲防守，以杜匪船窺伺。</p>
11	<p>東勢各社番除自耕番田外，大社週圍加留餘埔二里，小社加留餘埔一里，栽樹為界，作為番業，免其陞科。</p>	<p>是以楊廷理原議，大社週圍加留餘埔二里，小社週圍加留餘埔一里，立定界址，毋許漢人越界侵佔。茲據該鎮、道、府議請，所有東勢幾穆撈等一十七社，前已飭令通事土目將社番自耕田園沿邊栽插樹木，作為內界，只准社番自行耕種，不許漢人贖耕。其加留餘埔一里、二里之外，沿邊亦栽插樹木，作為外界，以杜漢人日漸侵佔之弊。所留餘埔，如現在社番人少，不敷耕種，始准贖給漢人開墾，呈官立案，按年完納番租，俾社番生計日裕。仍照番田永免陞科之例，免其完納官租，以示體恤。</p>
12	<p>蘇澳為前境東勢盡頭，港多礁石，如有熟悉沙線舵水大舟可入該地。現無居民，暫緩設汛，將來開墾成熟，即於扼要處所設立南關一座，以為東勢鎖鑰。</p>	<p>並於東勢盡頭附近蘇澳地方，再建南關一座，以為東勢鎖鑰。</p>
13	<p>此路由太平林進山，經大湖隘，從內山行走，可達溪洲。因山路險峻，經過生番地界，是以鮮人往來。今擬察探山勢，開通道路，以為入噶瑪蘭備道。</p>	<p>又一路由艦舡之大坪林進山，從內山行走，經大湖隘，可抵東勢之溪洲，係在泉人分得地界之內。</p>
14	<p>此路由九芎林進山，翻玉山腳、繞內鹿埔至叭哩沙喃口抵東勢。今亦察探山勢，安撫生番，借道開路，以為入噶瑪蘭備道。</p>	<p>又一路由竹塹之九芎林進山，經鹽菜甕，翻玉山腳，由內鹿埔可出東勢之叭哩沙喃口，係在粵人分得地界之內。</p>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國史大臣列傳次編》，國立故宮博物館藏，清內府朱絲欄寫本，檔案號故殿 011580。
- 〔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
- 〔清〕李維鈺原本，〔清〕沈定均續修，〔清〕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周鍾瑄主修，〔清〕陳夢林總纂，《諸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孟昭涵修，〔清〕李駒等纂，《長樂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清〕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清〕曹振鏞等奉敕修，《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版本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實錄資料庫」。
-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清〕黃叔燾，《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十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清〕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版本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實錄資料庫」。
- 〔清〕鄭鵬雲、〔清〕曾逢辰纂輯，《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清〕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不著作者，〈噶瑪蘭輿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 03-1693-034。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嘉慶年間噶瑪蘭番社分布圖〉，檔案號 T0357M0013。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3-1954。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95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天地會》，冊 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の台灣踏查日記》，臺北：南天書局，1992。
- 何兆欽主編，《藍氏族譜》，臺北：何藍韓姓宗親會，1970。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1995。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整理，《臺灣大學人類系所藏古文書》，編號 T015。
- 陳雲林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劉顯世、谷正倫修，《貴州通志》，成都：巴蜀書社，2006。
- Blussé Leonard,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 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0.

## 二、專著

- 邱秀堂編著，《臺灣北部碑文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
-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文化中心，1997。
- 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一個臺灣史的區域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2。
- Bayly, C. A.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 Elliott, J. H.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an, Seugnhyu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u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McMahon, Daniel.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Millward, James A.,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 Ng, Chin-Keong. *Boundaries and Beyond: China's Maritime Southeast in Late Imperial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17.
-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Walker, Brett L.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ang, Wenshe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三、論文及專文

李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期 62 期（2019 年 12 月），頁 11-14。

石文誠，〈古地圖的美學、風水觀與實用性：清代方志中臺灣府城地圖的探討〉，《白沙歷史地理學報》，期 16，2015 年 9 月，頁 41-68。

李姍姍，〈從《輞川圖》談起——淺論中國山水畫中的堪輿意識〉，《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5 期，頁 135-137。

李信成，〈清代噶瑪蘭族名制初探〉，《臺灣史研究》，卷 17 期 3，2010 年 9 月，頁 39-105。

李信成，〈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1，2012 年 3 月，頁 29-85。

李信成，〈清代邊區設治與原住民族治理——以楊廷理創始臺灣噶瑪蘭廳為例〉，收入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115-148。

李信成，〈清代宜蘭的官舉族長及其功能探討〉，《臺大歷史學報》，期 55，2015 年 6 月，頁 67-124。

李鹿萃，〈宜蘭平原土地利用的地理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研究報告》，期 3，1965，頁 28-57。

杜正勝，〈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古今論衡》，號 8，2002 年 7 月，頁 2-9。

李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臺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47-94。

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卷 18 期 2，2007 年 6 月，頁 1-60。

林開世，〈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一個人類學的反思〉，《臺灣人類學刊》，卷 5 期 2，2007 年 12 月，頁 63-122。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卷 39 期 2，1989 年 6 月，頁 95-98。

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期 19，1991 年 6 月，頁 46-50。

許雪姬，〈宜蘭開發史事探微——吳光裔事蹟考〉，《臺灣風物》，卷 31 期 3，1981 年 9 月，頁 31-42。

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卷 22 期 2，2015 年 6 月，頁 45-110。

- 洪健榮，〈近百年來海內外學界關於臺灣「風水」文化研究的歷史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期 38，2019 年 6 月，頁 1-48。
- 洪健榮，〈塑造境域「佳城」：清代臺灣設治築城的風水考量〉，《臺北文獻》，期 155，2006 年 3 月，頁 45-114。
- 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卷 10 期 1，2003 年 6 月，頁 1-32。
- 莊靈，〈從歷史影像憶談北溝故宮的故事〉，《止善》，期 23，2017 年 12 月，頁 17-60。
- 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灣史研究》，卷 24 期 4，2017 年 12 月，頁 1-33。
- 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 年 6 月，頁 109-164。
- 陳宗仁，〈前往東、西洋：《字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1-46。
- 陳宗仁，〈院藏清初福建省地圖——一幅新舊知識交雜的地圖〉，《故宮文物月刊》，期 357，2012 年 12 月，頁 32-41。
-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卷 23 期 3，2016 年 9 月，頁 1-42。
- 陳宗仁，〈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之研究：兼論鳳山縣關隘的描繪〉，《臺灣史研究》，卷 25 期 1，2018 年 3 月，頁 1-38。
- 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卷 27 期 3，2020 年 9 月，頁 1-42。
- 陳南旭，〈清代臺灣噶瑪蘭廳的成立與社會變遷（1786-18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
- 陳南旭，〈19 世紀初年臺灣北部的拓墾集團與噶瑪蘭的移民開發〉，《臺灣文獻》，卷 67 期 2，2016 年 6 月，頁 133-156。
- 陳南旭，〈經貿發展與臺灣邊疆的變遷：十九世紀之交的蛤仔難〉，《國史館館刊》，期 61，2019 年 9 月，頁 1-41。
- 溫振華，〈台北縣鄉土史的重建：以三貂社為例〉，《北縣文化季刊》，期 43，1995 年 1 月，頁 35-36、轉 45-48。
-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 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 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族群歷史圖像〉，收入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9-59。
- 詹素娟，〈有加有留（ū ke ū lāu）——清代噶瑪蘭的族群土地政策〉，收入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13-138。
- 詹素娟，〈賸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期 59，2003 年 11 月，頁 117-141。
- 盧雪燕、劉欣欣、許智璋、黃景彤，〈《臺澎圖》、《沿海岸長圖》為黃叔瓚所繪考：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故宮學術季刊》，卷 31 期 3，2014 年春，頁 155-198。

- 蕭婷 (Angela Schottenhammer), 〈帝國與邊緣：1644 年至 19 世紀清朝與日本及琉球關係比較研究〉, 收入李慶新主編, 《海洋史研究》, 輯 2,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頁 226-245。
- 簡宏逸, 〈從蟒甲到社船：1650 年代至 1750 年代臺灣北迴沿海航路的商業活動〉, 《臺灣史研究》, 卷 27 期 4, 2020 年 12 月, 頁 1-34。
- 蘇峯楠, 〈清治臺灣番界圖的繪製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啓為中心〉, 《臺灣史研究》, 卷 22 期 3, 2015 年 9 月, 頁 1-50。
- 蔡增仲、林仁川, 〈清代臺灣城市規劃的變體禮制思想〉, 《中華建築技術學刊》, 卷 7 期 1, 2010 年 6 月, 頁 57-76。
- 鄭螢憶, 〈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臺灣吳鳳信仰的形成〉, 《歷史人類學學刊》, 卷 12 期 2, 2014 年 10 月, 頁 57-58。
- 鄭螢憶, 〈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 《國史館館刊》, 期 60, 2019 年 6 月, 頁 1-41。
- 鄭螢憶, 〈北臺灣三貂社的族群互動與海岸社會變遷 (1685-1920)〉, 《歷史人類學學刊》, 卷 20 期 2, 2022 年 10 月, 頁 75-124。
- Aksan, Virginia H. and Daniel Goffman. "Introduction: Situating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World." In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eds.,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0.
- Chester, Lucy P. "The Mapping of Empire: French and British Cartographies of India in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Studies*, vol. 16 (2000), pp. 256-275.
- Dados, Nour Nicole. "Mapping Empir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In Alena Strohmaier and Angela Krewani, eds., *Media and Mapping Practic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ducing Spac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7-44.
- Elliott, Mark C. "Book Reviews: Pei HUANG,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JESHO*, 54:4 (January 2011), pp. 584-588.
- Hopkins, A. G. "Globalization—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2, pp. 1-11.
- Hostetler, Laura. "Global or Local?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26 (2007), pp. 117-135.
- Hsu, Cho-Yun. "I-L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33 (Spring 1972), pp. 51-71.
- Koot, Christian J. "The Merchant, the Map, and Empire: Augustine Herrman's Chesapeake and Interimperial Trade, 1644-73."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4 (October 2010), pp. 603-644.
- Lu, Cheng-heng. "The Art of being an Imperial Broker: The Qing Conquest of Taiwan and Maritime Society (1624-1788)" (Ph. D. dissertation, Emor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2020).



- McMahon, Daniel.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8:2 (June 2008), pp. 231-255.
- Perdue, Peter C.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June 1998), pp. 263-286.
- Po, Ronald C. "Writing the Waves: Chinese Maritime Writings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2 (October 2015), pp. 343-362.
- Rowe, William.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32:2 (December 2011), pp. 74-88.

#### 四、網路資源

- 〈臺北基隆近傍圖〉，<https://auctions.yahoo.co.jp/>（2020年8月24日檢索）。
- 「清代東部後山圖」，<https://thcts.sinica.edu.tw/themes/rc18-4.php>（2021年12月8日檢索）。
- 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汛塘望寮圖」，<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124>（2021年8月14日檢索）。
- 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汛塘圖」，[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3](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3)（2021年8月14日檢索）。
- 作者不詳，〈艋舺街至濁水海道圖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i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9679430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E8%89%8B%E8%88%BA%E8%A1%97%E8%87%B3%E6%BF%81%E6%B0%B4%E6%B5%B7%E9%81%93%E5%9C%96%E8%AA%AA&offset=0](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i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9679430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E8%89%8B%E8%88%BA%E8%A1%97%E8%87%B3%E6%BF%81%E6%B0%B4%E6%B5%B7%E9%81%93%E5%9C%96%E8%AA%AA&offset=0)（2021年10月6日檢索）。
- 作者不詳，〈噶瑪蘭廳輿圖纂要〉，出版年、地不詳，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本，引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https://stfb.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713344424584>（2021年10月6日檢索）。
- 林聖欽，〈宜蘭的河川與海洋、海岸線與港口〉，<http://www1.geo.ntnu.edu.tw/~t24010/100%E7%A0%94%E7%BF%92/%E5%AE%9C%E8%98%AD%E7%9A%84%E6%B2%B3%E5%B7%9D%E8%88%87%E6%B5%B7%E6%B4%8B.pdf>（2021年10月6日檢索）。
- 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rch\_cca100051-hm-od\_0052\_01-0001-i.txt（2021年10月6日檢索）。
- 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rch\_cca100051-hm-od\_1560\_01-0001-i.txt（2021年10月6日檢索）。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世紀臺灣輿圖〉，<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18.011.0001>（2021年10月6日檢索）。

## Crossing Beyond the Boundary: Mapmaking,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y of Maps of Kabelang from the Jiaqing Period

Cheng-heng Lu\*

### Abstract

In 1812, the Qing Empire established Kavalan subprefecture in Kabelang, indicating that Qing state power had both extended into the region and redefined the frontier and related boundaries.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paid the topic significant attention, but this article analyzes several maps to understand a specific theme: How was the spatial and geographic knowledge of Kabelang that had been shaped by those colonists operating beyond the boundary transformed into an official understanding for the Empire's practical use, a process which can be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local turn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1798, Wu Sha's 吳沙 (1731–1798) land reformation project invited Xiao Zhu 蕭竹 (?–?) to survey the area and draft a map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court to incorporate Kabelang. The resulting map, which shows certain geographic features as well as indicating a route from Bangka to Danli and then to Kabelang, was widely circulated throughout Taiwan society, thereby shaping the basic spati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gion. In 1807, for example, Yang Tingli 楊廷理 (1747–1813) went to Kabelang via the map's route to handle a matter concerning pirates. Afterward, Xiao Zhu's map, which was sent to Beijing by being appended to Xie Jinluan's 謝金鑾 (1757–1820) *Gezainan jilue* 蛤仔難紀略, became the source of knowledge for officials to apprehend the frontier area. Then based on Xiao's map, Yang drew his new version to present an official point of view, which would become the map to convince the emperor and court to integrate the region under the Empire's contro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cess of mapmaking displays how knowledge of the frontier gradually moved from local society, namely the illegitimate colonists outside of the Empire's boundaries, to being of use to the Empire, all of which suggests a local turn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Keywords:** Yang Tingli, Kavalan, Tamsui-Kavalan trail,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maritime frontier

---

\*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